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274期

## 华忆图书专辑（二）

### 【编者按】

墙里种花墙外开，寒梅海外报春来

### 【历史研究】

郭罗基 “梁效” 顾问冯友兰

前言

书摘 冯友兰为什么不会自杀？

作者小传

目录

### 【学术散文】

乔晞华 社会问题 40 问——西方社会学面面观

前言

结束语

书 摘 官僚制度利大于弊吗？

西方为什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

目 录

### 【回忆文集】

王复兴 暴风雨年代——北京大学亲历者回顾（三）

作者前言

书摘 孙蓬一与北大文革（节选）

目录

### 【随笔札记】

张子扬 我和我的学生们：一个教师的工作札记

自序 我爱每一片绿叶

后记 感谢生活

书摘 小金不寻常的成长之路

目录

### 【本刊声明】

【编者按】

## 墙里种花墙外开，寒梅海外报春来

2019年6月美国华文记忆出版有限公司在得克萨斯州（State of Texas）注册成立，简称“华忆”。华忆的宗旨是，出华语好书，为华人服务。

公司成立八个月以来，已出版学术论文、历史研究、回忆文集、文史散文、随笔札记及人物传记6种，共计17本。

作为一家海外华文出版社，华忆有如下特点。

第一，收费低廉。每本（480页以下）的书仅收980美元，也就是说，编/作者只须用6860元左右的人民币，即可在华忆出书。所出之书有实体和电子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均有国际书号（ISBN）。华忆还会为每本书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申领国图编目号（LCCN），并按国会图书馆的规定，呈交一本样书，以为备案之用。同时，大陆的编/作者获赠10本样书，欧美的编/作者获赠1本样书。

第二，讲究效率。通常情况下，一部编校完毕的“齐清定”的书稿，一周之内即可完成排版和书封设计，两周之内即可付梓问世，第三周编/作者即可在卢鲁网（Lulu）、巴拉芭网（Blurb）和谷歌网（Google play）上看到新书。在新书问世后的第一时间，华忆即会给编/作者向国内寄出样书，在没有突发的不可抗力的情况下，编/作者将在一个月内收到样书。

第三，重视服务。在接到客户信函的三个工作日内，公司主管即会答复。如来稿需要编辑和校对，华忆将为编/作者推荐资深的编校人员。编校、排版后的书稿和书封会交给编/作者征求意见。所赠样书，免费寄到编/作者指定的中国大陆的任何通邮地址。编/作者如需要更多的实体书，华忆将提供包印包邮的服务。

第四，分成合理，账目透明。华忆售书所得，除纳税之外，余者与编/作者五五分成。每年2月结账一次。用户可随时查阅各网站的销售情况。

得克萨斯一词来自印地安语，意为“朋友”。华忆虽远在大洋彼岸，但与国内作者休戚与共。它愿在大道沉沦，风雨如晦之际，为自由言说略尽绵薄。

华忆的信箱（Email）：RememPub@gmail.com

华忆的网站：jiyi2008.com，电话（Tel）：512-699-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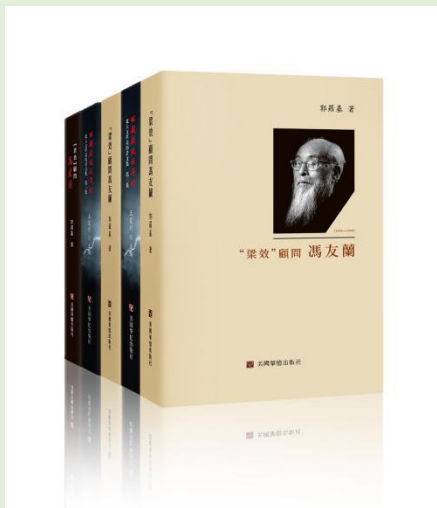
华忆的地址：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 【历史研究】

## 《“梁效”顾问冯友兰》序言

郭罗基



我本来打算写两本书，一本是《冯友兰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兴亡》。在构思提纲的时候，发现两者的内容交集，写起来重复必多。不如将两者合一，以《“梁效”顾问冯友兰》为题。这个题目是一箭双雕。本书的关键字是三个：冯友兰，“梁效”，“文化大革命”。论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冯友兰，不能不涉及冯友兰与“梁效”的关系；论说“梁效”，不能不涉及“梁效”与“四人帮”的关系；论说“四人帮”，不能不涉及“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关系。所以，研究冯友兰这个人物，可以窥知宏大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段。冯友兰是我的前辈，也是北大哲学系的同事，我对他有切近的观察。从冯友兰这一滴水也可以映照出“文化大革命”的海洋。

冯友兰初为“反动学术权威”，后为“批林批孔”的革命权威；阶下囚翻作座上宾。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人物。冯友兰的发达是因为攀上了“梁效”。

现在的80后、90后年轻人，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梁效”。

“梁效”是两校大批判组的译名，两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是古今中外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的写作班子，曾经独霸文坛，呼风唤雨，控制思想，左右舆论。“梁效”的成员是一伙“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叙述“梁效”的兴亡，首先是为了明真相、存史实。同时也是为了探究产生“梁效”的条件，以及如何消除这些条件，防止再生“梁效”。

我亲身体验到“梁效”的猖狂，终于又见证了“梁效”的灭亡。

我是有资格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我就批了冯友兰，批了“梁效”。我也有条件系统地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哲学系掌权，积累了揭批“梁效”和审查“梁效”的材料。但

是，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已经晚了。

“文化大革命”中，1973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各方面大力整顿，扭转乱局，使人们看到了希望。1975年下半年，形势忽然逆转。11月，从清华、北大开始，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整顿”戛然而止。“梁效”是急先锋。我为中国的时局忧虑，心中十分愤慨。当时正在课堂上讲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对这本书很不喜欢，教学小组的教师们大多不愿讲这本书，推来推去，推到我头上。我是教学小组组长，推不掉了。这本书是批唯心主义的，好在可以借题发挥。果然，机会来了。我在批唯心主义时联系实际，批了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风头正健，但他的唯心主义是众所周知的。冯友兰是“梁效”的顾问，我就说冯友兰把唯心主义带进了“梁效”。其实不能这样说。我是以冯友兰为跳板，跳到“梁效”头上。有一点困难，列宁批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冯友兰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联系起来不大贴切。工农兵学员是不难对付的，没有人从哲学上提出问题。但他们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向领导检举揭发。哲学系工宣队头头张某在全系大会上疾言厉色地说：“郭罗基，不批刘（冰），不批周（荣鑫），批起梁效来了。我们要跟他辩论！”“梁效”是碰不得的。那时节“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我成了“大辩论”的对象。我被赶下了讲坛，由黄枬森接替。我担任大学里最小的官职——教学小组组长，也被撤职了。工农兵学员参与的“大辩论”是大吼大叫。我不说话，逼着我“表态”；我一说话，又“打态度”，指责我“极不老实”。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不好的，我也不指望他们说态度好。那种辩论是靠取消对方的发言权取胜的。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了，行不行？”工农兵学员说：“不行，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那种辩论又是强加于人的。

迟群在一次办公楼礼堂的干部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喊叫：“有人批梁效，你是好汉站出来！”我早已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不在场，故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批梁效的，不是好汉。

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对批判对象总是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全面揭发，叫做“搞臭”战术。最有效的“搞臭”材料是男女关系、贪污腐化等等。在我身上找不到这些材料，有人挖空心思地提出：“他给儿子、女儿取名都包含反动思想，要他交待。”我给儿子的取名是郭听雷，我给女儿的取名是刘观云。按

当时的标准，确是有点“反动思想”。儿子出生于1967年，正当“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听雷”意为“于无声处听惊雷”，是诅咒“文化大革命”的。1976年，敲响“四人帮”丧钟的四五运动中，有人写了一个剧本，剧名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女儿出生于1971年，当时我凭直觉感到政坛将有风云变幻，果然三个月后发生了林彪葬身沙漠的“9·13”事件。“观云”的意思是“坐看风云变幻”。有朋友调侃说我们家是“政治气象台”。这一切都不能说。挨整的人往往自证其罪。承认了就会戴上“思想反动”的帽子。我忽然急中生智：“给儿子、女儿取名是什么意思？听，‘五洲震荡风雷激’，所以儿子叫‘听雷’；看，‘四海翻腾云水怒’，所以女儿叫‘观云’。你们说，‘包含反动思想’吗？”那两句是毛的诗，谁敢说“包含反动思想”？全场都哑了。我心中暗自好笑。

“四人帮”利用清华、北大两校搞事。从清华大学批刘冰点火，北京大学继之而起，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火往上烧。批刘冰，提出“追风源”，追到教育部长周荣鑫，又从周荣鑫追到邓小平。然后策划“点名批邓”，最后打倒邓小平。“点名批邓”完全是阴谋。先是从清华开始，北大紧接，制造舆论，似乎“点名批邓”是群众的要求，向政治局施加压力，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的决定。运动的名称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清华、北大，“点名批邓”先从小范围暗中开始，逐步升级，层层扩大，从秘密到公开。

1976年1月27日中午，周培源的大孙子到我家说：“爷爷请你马上去一趟，有急事。”还有周老手书一纸。我立即骑上车，跟他到周家。周老坐在客厅等我，说：“今天上午，党委常委开扩大会，搞‘点名批邓’，气氛很紧张。我没有发言，下午还要接着开，怎么表态？”周老是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我说：“你怎么表态都不得体。拥护批邓吧，讲点不痛不痒的话，是言不由衷；反对批邓吧，立即成为‘大辩论’的对象，又寡不敌众。你还像上午一样，不表态。不讲话，叫人莫测高深。来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由于周老在会上一言不发，第二天，党委派简报组的两个人，手持纸笔，到周家。说：“你在会上没有表态，可能时间不够。你补一个表态，我们可以写进简报上送。”周老说：“我有话在会上就讲了，会上不讲就是无话可讲。”那两个人轮番威胁利诱：你表态，对你和家人如何如何有利；你不表态，对你和家人如何如何不利。周老依然一言不发。那两个人猛抽烟，满屋子乌烟瘴气。僵持了一个小时，他俩只好告辞。



党委常委开了7次扩大会议，一次比一次扩大，最后扩大到两千人。

3月4日，召开全校大会，进行“点名批邓”。尔后，人人必须表态；谁不表态就同谁进行“大辩论”。我在与人谈论中朗诵了南宋陈亮的词，他在一片妥协苟安声中沉痛地喊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我说，20世纪的中国人也应有一个半个耻于向权势屈服的吧？我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就是“大辩论”的对象，“点名批邓”不表态，又罪加一等。本来是每天“辩论”一次，现在是每天“辩论”两次。

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五号档，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在清华、北大，五号档没有向群众传达，因为两校的运动早已超过五号档了，但特地向我一个人单独传达。那时我因情绪愤激，导致胃出血，住在医院里。哲学系工宣队拿著文件到病床前向我传达，要我表态。我说：“知道了。”“没有了？”“没有了。”工宣队警告：对中央文件的态度，是个严重的问题，你要好好考虑。工宣队传出去，郭罗基对“批邓”的表态只有三个字“知道了”。一个“批邓”积极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讲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你们知道吗？”“什么来历？”“过去皇上批奏折就是用这三个字。”工宣队恨恨地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

党委书记王连龙在一次干部会上点名：“北大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言下有罪大恶极之意。很好，比一个半个还多了一点。北大就有两个，别提“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了。即使在北大，恐怕也不止两个，只是我们两个比较引人注意罢了。大多数人的“批邓”表态，不过是在压力之下的逢场作戏，听说有人居然敢于不表态，反而受到了鼓舞。

周培源是国际著名人士，不能把他怎么样。“批邓”积极分子的火力集中到我身上。白天，接受“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劝说。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还要难熬。白天的“大辩论”，不让我讲话，我或是横眉冷对，或是闭目养神，省得动脑筋。晚上，面对亲朋好友的劝说，既不能横眉冷对，也不能闭目养神。他们都是一番好意，劝我：“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他们还说：“将来总有你讲话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都是古训，不好反驳。但人各有志，我不赞成他们的处世哲学，又不得不违拗他们的好意，内心很痛苦。

直到粉碎“四人帮”，我“靠边站”将近一年。没有工作，工宣队却勒令我每天要到哲学系所在地38楼去“上班”。大学教师不是坐班制，本来是不用上班的。工宣队把上班当作惩罚的手段。

1976年10月6日，抓了王、张、江、姚，10月10日深夜查封了“梁效”。查封“梁效”时，我在现场。

粉碎“四人帮”，我得以翻身。哲学系的师生推举我为“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掌了大权，人称哲学系临时政府首脑。“梁效”是个神秘组织，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揭开内幕。我保存了一批审查“梁效”、审查北大的“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内部档，很有价值，应加以利用，不使湮灭。

至今有关“梁效”的书只出了一本——《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明报出版社，1999年），作者是“梁效”中的范达人，自说自话。我这个当年“梁效”的反对派，是不是也应该写一本书？

我想写“梁效”，写“梁效”顾问冯友兰，久有此意。我的写作将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尽量找到文字的依据。但所有材料都留存在南京家中，1992年出国后，20多年不准回国，无法获取材料。我儿听雷，特地从上海到南京，费了好大的功夫，将家中所有的书籍和材料编了一个索引。根据索引，我指定所需的书籍和材料，陆续寄来。70年代的报刊文章，互联网上搜索不到，小弟耀基、好友秦伯益，又帮我复印、扫描，用电子邮件传来。他们助成了我的写作。我于2016年动笔，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顾问冯友兰》。正当完稿之际，2018年6月遭遇车祸，肋骨断了四根，并伤及大脑。打开手稿，好像不是我写的。写作停顿。过了很长的时期，忍着病痛，重操旧业。付出巨大的毅力，终于完成。又耽搁了一年多。

我写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更不是戏说，虽然有些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因为当时的现实就是荒诞不经的。我也注意细节的描写，历史的真实往往就在细节之中。为了说明“梁效”和冯友兰活动的历史背景，我对“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详加考证，梳理了来龙去脉，阐明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叙述不见于正史。我的努力，为存信史。揭示和记住荒诞的历史，是为了避免荒诞的历史重演；研究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

2019年11月于美国奥马哈



【书摘】

## 冯友兰为什么不会自杀<sup>1</sup>

郭罗基

冯友兰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安然无恙。不管党委统战部怎样动员，他既不鸣也不放。谁都知道他是老右派，本蛇就是不出洞，“阳谋”奈我何！他还嘲笑有些右派分子“想凭口舌之争和共产党轮流坐庄”。内部政治排队，把他列为“中右”。即使戴不上右派帽子，也要让他与“右”沾点边。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精明如冯友兰也难逃一劫。因为章法变了，不是搞“大鸣大放”，而是看人头上的“帽子”。“言论罪”转为“身份罪”。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说话就有罪，到了1966年，不说话也有罪。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只要你是学术权威，没有不反动的；只要你是当权派，没有不走资的。一律揪将出来，打倒在地，踏上一脚。其他头上有帽的什么“分子”，也在劫难逃。奇就奇在，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翻过身来，成为“批林批孔”的革命权威，当上“梁效”顾问，又被钦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友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值得研究的一种典型人物。

### 大号“反动学术权威”——二冯

哲学系的“二冯”——冯定<sup>2</sup>、冯友兰是北大全校大号的“反动学术权威”。

<sup>1</sup> 此文选自此书第二章，这里的标题不是作者的原标题，而是从文中起的。文中的注释编者有删节。

<sup>2</sup> 冯定（1902—1983），浙江宁波人。1925年参加中共。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30年代脱党，在上海以写作为生。抗战初期重新入党，参加新四军，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1947年出版了一本通俗哲学著作《平凡的真理》。1949年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局撤销后，到北京任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马列学院撤销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文化大革命”前，因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具有赞同苏共20大的某些观点而作为“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

文革初期，哲学系尚能控制局面，没有发生乱批乱斗，只是建立了一个“老教师学习小组”，由青年教师王湘波负责。但每天校外有几万人涌入北大，<sup>3</sup>冲击了正常秩序。各种载人的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数公里。“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节目。

他们除了看大字报，还要到处寻找“黑帮”，因为在本单位没有见识过“黑帮”。找到了“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就揪出来批斗。所谓批斗，无非是辱骂、起哄，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常常进行人身侮辱，揪耳朵，打耳光。总理办公室曾派人来看翦伯赞<sup>4</sup>，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条，就是斗我的时候，让大人来斗，别让小孩来斗。”

冯友兰参加了“老教师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多数是中国哲学界的精英。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有一项莫名其妙的措施，只保留北大一个哲学系，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撤销，把有学问的人调到北大哲学系。这个小组的成员是：

中国哲学史教研室 冯友兰（教授）、黄子通（教授）、张岱年（副教授）、朱伯昆（讲师）（1956年后没有评定职称，当时的讲师年纪都不小了，故列入“老教师”）；

西方哲学史教研室 任华（教授）、洪谦（教授）、熊伟（教授）、郑昕（教授）、齐良骥（副教授）、张世英（副教授）、王太庆（讲师）、张颐（教授，久病不出）；

逻辑学教研室 王宪钧（教授）、李世繁（副教授）、晏成书（副教授）、吴允曾（讲师）；

<sup>3</sup> 撤销工作组以后的两周内，来北大“串联”的，达71.8万多人次，8月12日这一天，就有13.8万多人次。9月2日，校刊《新北大》报道，从7月29日至8月28日，校外来北大“串联”者，共约212.4万多人次。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50、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sup>4</sup> 翦伯赞（1898—1968），湖南常德桃源县人。据他自己考证，湖南常德的翦姓为维吾尔族。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潜心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问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937年5月，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1958年公开党员身份。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前，因持有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让步政策”的观点而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坐实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项目组副组长、北京卫戍区军官巫中，拿着枪逼他写揭发检举材料。他拒绝作伪证，以死抗争。于1968年12月18日与夫人戴淑婉双双服安眠药自杀。

美学教研室 宗白华（教授）、邓以蛰（教授）；

心理学专业 唐钺（教授）、沈迺璋（教授）、周先庚（教授）、沈履（教授）、桑灿南（副教授）、邵郊（讲师）。

金岳霖（教授）和贺麟（教授）本来也是北大哲学系的，哲学研究所成立时调去当研究员了。

文革前，北大党委就很注意哲学系的老教师，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不仅有首屈一指的唯心主义大师冯友兰，还有一些国内第一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sup>5</sup>

冯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的教授。该教研室都是中青年教师，只有他一个老教师，但他一向被认为是“老干部”，而不是“老教师”，故不在“老教师学习小组”中。他每天被校外闲人揪出来批斗数场，导致厌生。

1957年1月，冯定调来北大。此前，他是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马列学院一分院是为外国共产党（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培养干部的机构。后来发现，脱离本国的实际，从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就像当年苏联为中国共产党所培养的干部那样，大多成了教条主义者。1956年，撤销马列学院一分院；二分院是培养国内干部的，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毛主席对冯定的安排有指示：“就当一个教授，不要当领导。”他主张，冯友兰可以讲他的唯心主义，让冯定讲唯物主义，两家唱对台戏。谁知课堂上的对台戏没有唱起来，冯定的讲课并不吸引人。

文革中，二冯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同唱一台戏。但有不同的唱法。冯友兰唱唯心主义，默念心中的“理”，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若无其事，倒也自有一番淡定。冯定唱唯物主义，注视外部世界的现实，又看不到希望，就想了此一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但并非唯物主义全部都是真理、唯心主义全部都是谬误；也不是唯物主义一定有用、唯心主义一定无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有“聪明的唯心主义”，也有“愚蠢的唯物主义”。说对了，冯友兰能够度过文革的劫难，靠的是“聪明的唯心主义”；而冯定不想

<sup>5</sup>《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1966年1月5日）所载陆平的发言。

活了，就是“愚蠢的唯物主义”。当然，更多的是“愚蠢的唯心主义”和“聪明的唯物主义”。

冯定曾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发现及时，经抢救，没死。尔后把他藏在北大“校文革”所在地一院的楼上，保护起来，由青年教师彭燕韩看着。一来避开校外闲人的批斗，二来防止他再度自杀。有一天，我在厕所突然遇见一个人，胡子半尺长，仔细一看竟是冯定。四顾无人，我悄悄地问他：“你还好吗？”他说：“我在这里坐牢，度日如年！”我劝慰他：“外面很乱，你在这里是安全的，耐心地待些日子吧。”说来奇怪，挂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牌子的地方，成了青龙白虎堂，谁也不敢冲击。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牌子都被砸烂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就显神威了。红卫兵明知冯定在楼上，没人能把他揪出来。

哲学系本系没有开过批斗会。那个“老教师学习小组”，把他们聚在一起（有时在哲学系办公室，有时在冯友兰家的客厅）学习，避免了校外闲人的批斗，客观上起了一点保护作用。

## 冯友兰会不会自杀？

冯定自杀后，人们关注“二冯”的另一冯，冯友兰会不会自杀？

哲学系心理专业<sup>6</sup>的教授沈迺璋<sup>7</sup>留学法国时，在巴黎的胡子比赛中得过三等奖，平时小心修剪，爱护有加。红卫兵勒令：“把你的洋奴胡子剃了！”冯友兰也留有胡子。他留的是鲁迅所说的因地心引力向下垂直的中式胡子。冯友兰闻讯沈迺璋剃了心爱的洋胡子，他也赶紧剃了从1939年留起的长胡子。这两个人，胡子一剃，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sup>6</sup> 自从1879年莱比锡大学教授冯特创立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以来，心理学就从哲学分化出来，成为实证科学。原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均设心理系，院系调整时把它们并入北大哲学系，作为哲学的一个专业，又倒退到19世纪的冯特以前。这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中国特色”的教育设计。80年代，改革开放中，为了与国际接轨，心理专业才脱离哲学系，独立成系。

<sup>7</sup> 沈迺璋，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11年生。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心理系，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心理系。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进修。1938年回国，因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府服务而赋闲在家。后任辅仁大学讲师。1945年任燕京大学教授、心理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心理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在心理学界200多人参加的讨论会上，沈迺璋发言反对苏联学者认为心理现象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6年10月6日服毒自杀。

沈迺璋为原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院系调整前是燕京大学“骂人团”<sup>8</sup>的成员。肃反运动中免不了受冲击，后来虽然“落实政策”，心灵的创伤难以平复。他说：“我临死前要把亲人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终于摆脱了共产党的统治！’”这本是家里的私房话，不知怎么被揭发了出来，这还了得！他被挂上“反共老手沈迺璋”的大牌子，勒令在校园里自动游街。游了一阵子，自杀了，并没有把亲人叫到床前。人们又担心：冯友兰学沈迺璋剃了胡子，会不会学沈迺璋也去自杀？哲学系的同事叫王湘波：“快到冯家去看看。”

### 冯友兰说“自杀不是人”

文革初期，北大自杀的人不是很多。人们有经验，运动初期戴的帽子不一定牢靠，还要看运动后期怎样落实政策。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sup>9</sup>进校后，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文革初期戴的帽子非但没有抖落，反而有加高、加大之势。一些人以为这就是“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绝望了，纷纷自杀。每有人自杀，校园里就刷一条大标语：“XXX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样的大标语数了四十多条。<sup>10</sup>直到年底翦伯赞夫妇自杀，惊动了上面，派人来调查。除了已经自杀的，“牛棚”里仍关着800多人，另外还有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单独关禁闭的（本人也在单独禁闭中）。总之，“阶级敌人”占了当时在校人数的10%以上，在教职员工中占了将近40%，坐实“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上面发话要纠偏。特别是1968年10月31日，毛主席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了冯友兰、翦伯赞的名，说“这些人是有用的”。刚说完就死了一个。军宣队的负责人说，不能再让冯友兰自杀，否则对不住毛主席。哲学系军宣队陈某，找冯友兰谈话。军宣队愚蠢，冯友兰迟钝，转弯抹角谈了半天不开窍。陈某急了：“直截了当说吧，你可不要自杀啊。”

<sup>8</sup> 当时燕京大学有几位教授常常高谈阔论、臧否人物，被人称为“骂人团”。它的主要成员是聂崇岐、齐思和、陈芳芝（女）、沈迺璋，前三位都是历史系教授。

<sup>9</sup> 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曰“宣传队”，实际上是军管队、专政队。

<sup>10</sup> 文革中，北大以各种方式被迫害致死的已知63人。见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



冯友兰回答：“我决不自杀，自杀不是人！”<sup>11</sup> 陈某一听，放心了，笑着调侃道：“你自杀就成鬼了，当然不是人啦！”冯友兰从来没有想到自杀，所以连冠冕堂皇的话都不会说。

## 冯友兰为什么不会自杀？

汤一介的回忆录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我问冯先生：‘当时几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唐代高僧禅宗六祖惠能（638-713）的一个四句偈——郭]。我们相对大笑。”<sup>12</sup>

冯友兰真是唯心主义到家了，他对于批斗、抄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1967年1月7日，冯友兰因前列腺炎肥大，小便不通。往阜外医院诊治无效，转协和医院。因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得住院。15日发生尿中毒。对于自己身上的病痛，不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了。老夫妻俩坐困愁城。几经周折，才住进北京医院。但第一次手术后医院的造反派夺权，即令出院。冯友兰挨批斗时，手里还提着尿瓶。经哲学系文革联系疏通，于2月底再进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冯友兰获哲学系文革通知时动了感情，与老妻任载坤相对而泣。

1967年4月4日，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一锅煮。批斗的对象有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蒋南翔（教育部长）、吴子牧（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宋硕（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北大党委书记、校长）、彭珮云（北大党委副书记）、翦伯赞（历史系教授、北大副校长）、冯定（哲学系教授、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友兰（哲学系教授）、朱光潜（西语系教授）。这次大会我没有参加。听人说，陆定一、周扬等老干部看起来都很痛苦，只有冯友兰面无表情，

<sup>11</sup> “……不是人”乃冯氏口头禅。年轻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本日记为练习有恒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记若不记完，非人也。”见王仁宇《“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光明日报》2016年1月19日。

<sup>12</sup> 张弘：（凤凰网主笔）《汤一介的忏悔录：文革中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据汤一介《我们三代人》一书编写。



好像在练马步气功。批斗之后，他就做一套自创的健身运动，活络筋骨，以矫驾“喷气式”之僵直。人们见到他在院子里做操，就知道他又被批斗了一场。

冯友兰的女儿冯锺璞说她的父亲“身上有仙气，就是万事想得开”。燕南园里最想得开的两个老头，一个当然是57号的冯友兰，哲学家；还有一个就是66号的朱光潜<sup>13</sup>，美学家。朱先生爱散步。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叼着烟斗的驼背老人在校园里缓缓踱步，就是他。他还有一样怪脾气，上门拜访，不出五分钟，他就把你晾在客厅，独自上楼，回书房去也。在校园里散步时同他聊天，却不论时间长短。有时，以至家人出来寻他，喊他回去吃晚饭。我就是常找他散步的机会和他讨论问题。他曾赠我一副对联：“持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文章。”想必这也是他本人的处世哲学。自从他当了“反动学术权威”，校园里久不见他的身影。一次偶遇，我问：“现在你不散步了？”他说：“现在散步有了风险，说不定被人揪住，随时批斗一番。我现在找个僻静的所在，改行日光浴了。”好心情，散步有风险，改行日光浴，照样健身体！我含蓄地说：“您多保重！”他说：“你放心！毛主席说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我再加一条：相信自己！”他曾公开宣称：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想得开靠的就是“聪明的唯物主义”。

他们想不开的邻居64号的翦伯赞，历史学家，就自杀了，55号的冯定，哲学家，自杀未遂。50号的向达<sup>14</sup>，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版本目录学家，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文革初期，在劳动改造中发病，无人搭救，凄然死去。他还没有来得及选择“想得开”或“想不开”，生命就结束了。

<sup>13</sup>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今枞阳）人。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是哲学系和西语系的跨系教授，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文革之后，他在香港讲学时宣称：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生著作译述甚丰，留下30卷全集，计600万字。

<sup>14</sup> 向达（1900—1966），土家族，湖南溆浦人。1924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敦煌学，出版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和论文70余篇。1935年赴欧洲游学，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搜寻抄录流失海外的汉语文献资料。1938年携带数百万字的资料回国。历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1年、1943年两次参加西北考察团，对敦煌千佛洞的管理提出建议，并发表研究论文多篇。亲自踏勘汉代玉门关、阳关，确定故址。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同时兼任《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的“鸣放”中畅所欲言，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

最想不开的要数中国近代物理学开山祖师式的人物之一饶毓泰<sup>15</sup>，人们说不清他为什么要自杀。据传，有人说他“里通外国”。文革中，这类吓人的罪名多了去了，最后落实不了的。主要是他的个性刚烈，不容玷污。有人说他像玻璃，通体透明，坚而易碎。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优点变成了缺点，以至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任人贬损又不惮自我贬损、毫无尊严的人，缺点成了优点，反倒是“适者生存”。

这些想得开的和想不开的，都是一级教授。想不开的翦伯赞，是因为逼着他揭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他说“实在交待不出来”。宁可赔上自己和夫人的老命，不讨好、不害人、不上钩、不造假。想得开的冯友兰，后来背叛自己的祖师爷孔夫子，新儒家忽然变脸，成为批孔反儒的干将。他们为人的态度、人生的意义，岂可以“想得开”或“想不开”来区分？

196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著名科学家赵九章自杀。周总理听到汇报后，立即命开列“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事实上无法保护，饶毓泰就在“保护名单”上。尔后“重要科学家”自杀、被杀者仍时有所闻。

## 红卫兵抄家

冯友兰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无数次，大多是校外中学的红卫兵干的。1966年8月，抄家、揪斗成风，明明是黑色恐怖，却称“红八月”。在40多天里，北京

---

<sup>15</sup> 饶毓泰（1891—1968），字树人，江西临川人。父为清朝举人。戊戌变法后，饶毓泰受新思潮影响，舍科举，习科学，满怀科学救国的抱负。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1917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1922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发表在1922年的美国《物理学评论》上，一举成为当时世界物理学十大先声人物之一。同年回国，应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之邀，到南开大学任教，创建物理系，自任主任。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列，被称之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南开培养的学生中，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江泽涵、陈省身等日后均成为著名科学家。193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任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与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赵忠尧等一起，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黄昆、张守廉等。抗战后，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后，因年老力衰，辞去院、系领导职务。1955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曾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政协常委。1968年10月16日夜，在军宣队进校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家里上吊自杀。

大学被抄家的有407户，其中教授134户，副教授59户。<sup>16</sup>北京市被抄家的33600多户，被打死的有1700多人，所谓“五类分子”85000多人被赶出北京。<sup>17</sup>

冯友兰有个爱好：收藏中国古代兵器。他的先祖石泉公是清道光年间的武秀才，因而家中刀枪列阵，还有护院拳师，教年轻子弟舞枪弄棒。冯友兰自幼年时就喜欢摩挲古代兵器。久居北京，收罗了一些古董，在清华大学曾举办过展览。1949年后大多献给博物馆了，他曾捐献249件明清时代兵器 and 一百多支箭。他说：“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内，在旧兵器那一部分中，有许多我能认出来是我收藏过的。”<sup>18</sup>冯友兰的长子、美籍华人冯锺辽，于2015年91岁高龄时，特地率一家三代八人，从旧金山到北京，参观国家博物馆中他父亲捐献的古代兵器。

冯家尚有秦代的刀剑、唐代的执拂等。《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向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红卫兵上阵以来，所向披靡……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不知哪来的一支红卫兵队伍，审问冯友兰：“为什么私藏杀人武器？这些杀人武器是从哪里来的？作什么用？”让他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请罪。冯友兰平时说话就口吃，西南联大的学生嘲讽说：“冯先生上课，一句话在黑板上写完了，口语还没说完。”红卫兵拍桌子、打板凳，气氛紧张，冯支支吾吾，更是说不清，于是对老人动手动脚。这时，住在隔壁的文革中搬进冯家的物理系年轻女教师，敲打板壁，嚷道：“午睡时间，不要吵醒我的小孩！”那边厢静了下来，救了冯友兰的急。

哲学系负责老教师学习小组的年轻教师王湘波，到冯友兰家了解情况。只见一片狼藉，古玩全都没了，连厨房里的“六必居”（北京的老字号）的咸菜也被抄走了。王湘波在垃圾堆里发现一张单据，是英国银行的存款（后来了解是冯友兰的著作在英国翻译出版的稿费）。红卫兵盗贼不识英文，幸免了。他收起来，代为保存，日后归还。王问冯家老太：“为什么不打扫一下？”回答说：“反正还要来的。”这一时期，教授中的53%，中层干部中的80%，均被抄家。<sup>19</sup>据统计，8月末9月初，北京的红卫兵就抢劫了33,695户家庭，<sup>20</sup>斩获黄金10.31

<sup>16</sup> 《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8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sup>17</sup> 《历史的审判》第202页，解放日报编辑部编印，1981年1月。

<sup>18</sup> 《冯友兰自述》第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sup>19</sup> 《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sup>20</sup>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第26页。

万两、白银 34.52 万两、现金 5545.99 万元、珠宝首饰 61.36 万件。<sup>21</sup> 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抢劫的规模，它们只是上交给中国银行的数字，没人知道他们给自己留下了多少。

抄家的红卫兵收走了钥匙，冯家的衣物拿不出来。入冬后冯友兰挨批斗时只好身披麻袋。

## 冯家门口贴了一张挡驾抄家的告示

冯友兰接到红卫兵的一纸通知，命他明天五点之前将所有的“坏书”交到 38 楼 XXX 号。他跑去一看，那是哲学系的学生宿舍。他对红卫兵说：我的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封资修。要把两个房间的书运来，缺乏劳动力，我们两个老头老太太搬不动呀。而且还需要交通工具，至少两辆卡车。再说，书运到这里，你们这个房间也装不下呀。红卫兵一听，说得有理，他们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就说：这样吧，我们去贴上封条，谁也不许动！封条一贴，反而起了保护作用。冯友兰本人反正不看书了，别人也不敢启封。有的红卫兵听说古书值钱，但不知哪一部，动手翻找。冯友兰对他们说，这是哲学系的红卫兵查封的，你们要启封，得跟他们商量。哲学系红卫兵，牌子很硬，只好住手。冯友兰家的藏书，经过“文化大革命”，居然没有多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冯定家的藏书就惨了。他有一部《金瓶梅》，红卫兵发生争抢，一个人抢到上册，另一个人抢到下册。没有抢到的人就宣布：“抄家物资不能归个人所有！”说得理直气壮。那归谁所有？根本没有章法。冯定家还有许多“灰皮书”“黄皮书”也被一抢而空。文革前出过许多内部发行的书，大多是苏联和西方的著作。政治、哲学类著作，封面是灰色的，故曰“灰皮书”；文艺、小说类著作，封面是黄色的，故曰“黄皮书”。内部发行还要论级别。按我的级别，可以买到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沙夫的《人的哲学》等书。冯定是行政六级的高干，所有的“灰皮书”“黄皮书”他都能买到。这些书，红卫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如获至宝。后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跟着上山下乡了。在老干部、大知

<sup>21</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71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原注据《北京晚报》1987 年 2 月 23 日报道。

识分子家抄来的“灰皮书”“黄皮书”，都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悄悄流传，形成所谓“地下读书运动”。公开的读书，只能读“红宝书”。这些“灰皮书”“黄皮书”，被目为坏书，只能悄悄地读。好在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没人管。影响较大的“灰皮书”，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以及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影响较大的“黄皮书”，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有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这些偷来、抢来的书，对于打开空洞的头脑、转变偏执的思想、造就“思考的一代”起了有益的作用。一个事件中的消极因素，在另一个事件中成了积极因素。

王湘波向哲学系负责人党总支副书记、系文革副主任赵正义<sup>22</sup>汇报，冯家搞得不能正常生活了，建议不能再让红卫兵去抄家了。在别的系，恐怕没人敢讲这样的话。这不是同情“反动学术权威”吗？当时北大党委和各系党总支都垮台了，只有哲学系党总支是“革命的”，依旧实行领导。因为哲学系党总支是“革命的”，讲话有点底气。赵正义把哲学系的红卫兵找来，要他们到冯友兰家去把门。红卫兵说：“那怎么行，轮流值班要耗费多少人的时间？出一张告示算了。”所以，在冯友兰家门口贴了一张北大唯一的挡驾抄家的告示：

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家已经被抄过多次了，希兄弟红卫兵组织勿再入内。

署名是“哲学系红卫兵”。但这一告示也不能完全挡住。林彪说“红卫兵是天神天将”。他们无法无天，除了“红司令”伟大领袖毛主席，谁的话也不听，照样“入内”。进去一看，书封了，值钱的东西没了，这才悻悻而出。

哲学系的红卫兵还对冯家人说：“以后只有我们系的红卫兵来你们才开门，如果不是我们系的人，无论什么人来，都不要理他们，他们无论怎样打门，都不要开。”于是冯家老太就打发保姆清理一下屋子。

校外来的人，出于好奇，想看看教授家是什么样子。一天，冯家门外聚集了上百人，要求进去。因为哲学系的红卫兵有话在先，冯家老太敢于不开门。有一

<sup>22</sup> 总支书记、系文革主任聂元梓，现在是校文革主任，不管哲学系的事了。



个人隔着窗户对老太说：“我保证维持秩序。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去绕一圈就出来。”他果然把外面的人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指定人带队。老太开了门，他们按次序进门转了一圈就出去。老太很感动，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好什么？好干部，好学生，都不合适，这群人本是乌合之众，有了：“好群众！”那些人问：“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我恰好从燕南园后门经过，听到从冯家出来的人发表观感：“乖乖，教授之家像仙人洞！”我就进去向冯家老太问个究竟。

冯友兰的女儿冯锺璞（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一文中说到她的父亲：“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sup>23</sup>“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多数人能做到“不自杀、不发疯”，宗璞特别提到“不沉默”。冯友兰不甘于沉默，这是多数人不能做到的。作为一个打倒的对象，怎么才能“不沉默”？那就是通过检讨来发声。📌

## 作者小传

生当国难临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次年，一生的记忆以战争、流血、离乱为始。长于鱼米之乡——东林党人的发祥地、民族资本的大本营、太湖之滨的无锡城，乃资本主义文明与传统文化交汇之地。



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晚年又反对中国共产党，备受打击迫害。

1949年以后，为党政干部，当过科长、秘书、团委书记、党委书记。因追求思想自由，告别官场，报考大学，重新选择学者之路。

小学没有毕业就上中学；中学没有毕业就上大学；大学没有毕业就当教师。1955年考上北京大学。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作为学生（中共）党支部书记，不愿将一些有才华的同学打成右派分子，被指责为右倾。

1958年，提前两年毕业留校任教。当学生学的是历史，当教师教的是哲学。

<sup>23</sup> 宗璞：《向历史诉说》，宗璞、蔡仲德编《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卷》，第59-60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



平生没有任何学位；自己没有学位，还要指导别人读学位。

60年代，由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批评共产党，被党组织称为“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

历次运动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文革中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场劳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靠边站”将近一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北大哲学系师生推举为“领导小组”组长，取代党的领导，人称“哲学系临时政府首脑”。

1977年，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批评北京市领导人吴德，开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批评领导人、投反对票之先例。

70年代投入思想解放运动，发表文章。1979年，参加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是为思想解放运动之高潮。

对别人宣传思想解放，自己为人则谨小慎微。

鼓吹言论自由，反而被剥夺言论自由。

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中箭落马，遭中宣部批判。

1982年，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的帽子，被邓小平赶出北京，发配南京。在南京大学受软禁10年。

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却饱受不民主之苦。

因怀抱理想而被吸纳入党，又因坚持理想而被清除出党。从党内的异议分子变为党外的反对派。

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六四”枪声一响，教授资格和博士生导师资格全都被取消。与此同时，收到纽约科学院的通知，被增选为院士；并收到中国人权（总部在纽约）的通知，被增选为理事。

因被剥夺讲课的权利、出国的权利，向法院起诉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非法剥夺公民权，官司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控告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党委的第一个案例。法庭上虽未取胜，事实上争得了出国的权利。

1992年，应纽约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纽约，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在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搞自由化，在自由化的美国又讲马克思主义。在哥

伦比亚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19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又从史学、哲学进入法学。名曰资深研究员，实际上研究工作既欠资也不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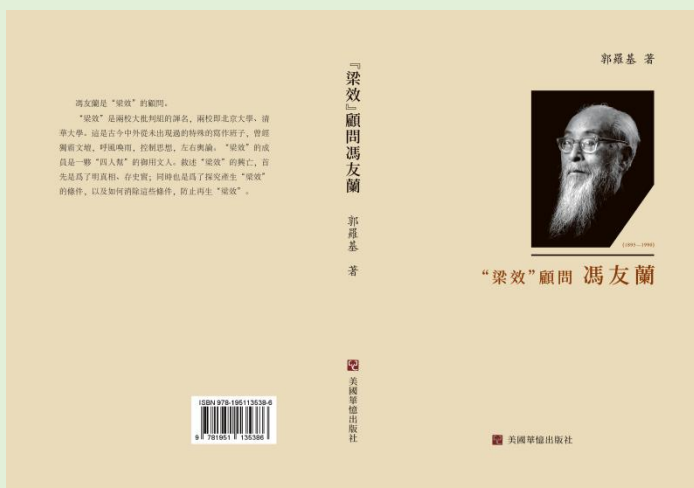
爲中国而研究，研究成果又进不了中国。

在中国是异议人士；在海外的异议人士中，又成了异议人士。

矛盾一生，碌碌无爲。

16岁的时候被国民党政府列入追捕的黑名单，60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放逐的黑名单。

中国政府始而不准出国，出国后又不准回国，流亡美国至今已27年。☞



作者：郭罗基

责编：耳梁

美编：惊动工作室

ISBN=978-1-951135-38-6（实）

978-1-951135-39-3（电）

LCCN=2020 903278

字数：33万

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0年2月第一版

## 【目录】

### 第一章 一生文章应帝王

庄子的“应帝王”和冯友兰的“应帝王”

“应帝王”和立“新统”

未成“帝王师”，沦为“帝王奴”

“中体西用”乃根本

### 第二章 靠聪明的唯心主义渡过文革劫难

大号“反动学术权威”——“二冯”

冯友兰会不会自杀？

冯友兰说“自杀不是人”

冯友兰爲什么不会自杀？

红卫兵抄家

冯家门口贴了一张挡驾抄家的告示

### 第三章 检讨标兵

第一段 抗战时期

第二段 解放前后

第三段 抽象继承

第四段 人性论

第五段 藉孔子的僵尸，向毛泽东思想反攻

第六段 近一两年的错误言论

第七段 自我鉴定

### 第四章 表态高手

冯友兰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军宣队骂冯友兰“笨蛋”

冯友兰善于找题目表态

政治运动中更是积极表态

江青的关怀和冯友兰的献诗

抓住一切机会歌颂毛泽东

### 第五章 “当代孔子”向古代孔子宣战

时来运去生感叹

群众自发批极左

反左与反右的较量

《人民日报》批极左

毛泽东亲自出马做裁决

《人民日报》的“批邪”运动

反左倾的代表何以又成为左倾的代表？

毛泽东自认一生做了两件事

孤独的晚年

“批林”又“批孔”，坐实林彪的极右

“批林批孔”的吼声

毛泽东批评冯友兰的不老实又需要他的不老实

冯友兰的起义

毛主席钦点冯友兰

毛主席对冯友兰迟到的关怀

## 第六章 “批林批孔”大开张

奇特的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怎样炮制出来的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

江青放出“炮队”

“一·二五”大会露峥嵘

“三箭齐发”

批了郭沫若，又批梁漱溟

批了中国人，又批外国人

翻江青的土改老账

“梁效”承蒙接见

鹿死谁手看两家

江青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

“批林批孔”又成动乱

## 第七章 “批林批孔”中出世的怪胎——“梁效”

一个奇特机构

一个神秘据点

“梁效”是谁领导的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了“周公”再批“周公”后

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的尴尬

“批林批孔”演化为“儒法斗争”

“四人帮”对冯友兰来说是后生小子

说《红楼梦》、评《水浒传》也是战场

“梁效”式的大批判风行一时

“梁效”的特殊使命

## 第八章 冯友兰怂恿江青做皇帝

江青自比武则天

女的要掌大权

顾问咏史颂女皇

又夸吕后了不起

“梁效”为江青效劳的多功能

小米粥里有政治

幸临“梁效”据点

“谄媚江青”何所求？

## 第九章 “梁效”的萧条

邓小平复出

全面整顿大见成效

毛提出理论问题

“四人帮”贩卖私货——反经验主义

毛说“不要搞四人帮”

江青后院起火

“梁效”像断了线的风筝

## 第十章 “梁效”的疯狂

形势逆转

毛远新这个小人物起了大作用

邓小平自称“桃花源中人”

“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清华大学点火

北京大学继之而起

“追风源”害死周荣鑫

“追风源”追到邓小平

“点名批邓”是阴谋

紧跟清华、北大的第三家

中国特色的悼念式抗议

北大的清查和冯友兰的捧场

“批邓”与“反周”

“梁效”发出“大进攻的信号”

“梁效”抢先点出最大的走资派

歪曲和篡改阶级斗争学说

何谓“本质上的联系”

从“批邓”到“批一层人”

## 第十一章 “梁效”的覆灭

策划“效忠信”

借外国人说中国事

“四人帮”的目标和手段

“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

制造警惕“右派上台”的舆论

“梁效”论证“按既定方针办”

什么是“既定方针”？

发难的号角成了灭亡的丧钟

中南海的怀仁堂之变

夜半“梁效”遭查封

## 第十二章 “梁效”的后事

“穆仁智审查黄世仁”

两个“凡是”压制对“四人帮”和“梁效”的揭发批判

审查“梁效”的三个阶段

群众要求对审查“梁效”的人进行审查

捂盖子的方针和群众的抗争

从批判“梁效”入手打翻身仗

审查“梁效”的结果

“四人帮”的动员令是“梁效”擅自发出的

对人的处理

冯友兰的“解脱”

“梁效”分子有一点悔悟吗？

把“梁效”作为研究对象

附一 “梁效”最后成员39人及顾问的名单

附二 “梁效”的著作一览

《文章选编》（1-4）

未列入《文章选编》及《文章选编》出版后发表的著作

## 第十三章 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钱锺书在美国究竟说了什么？

冯锺璞挑起事端

该骂不该骂？

迫害章廷谦的罪责在谁

制造冤假错案的“清理阶级队伍”

## 第十四章 道术多变迁，平生不老实

哲学史研究的开创之功

一种岂有此理的理学

“新理学”的矛盾

重写中国哲学史

给自己做总结

高智商，低人格

参考文献

作者小传



## 【学术散文】

## 社会问题 40 问

### ——西方社会学面面观

#### 内容摘要



本书以问答的形式，用通俗的语、慎密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分别从东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出发解释了社会学的范围、要点；分析了社会学涉及的方方面面，以及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本书介绍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事物的方法等，不失为一部了解西方社会学的参考书。

乔晞华、张程著

版次：2013年10月第一版

2019年7月第二版

字数：125千字

ISBN：978-1-951135-00-3（平装本）

978-1-951135-01-0（电子本）

LCCN：2019910540

## 前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深信共产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为敌的资本主义社会理应对马克思理论痛恨有加。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马克思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界大行其道。马克思著作是西方社会学学生的必读书。和谐理论遭到马克思的极力反对和痛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社会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却并不长。从欧洲在大学里成立第一个社会学系至今不过一百多年。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问题，许多问题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本书以问答的

形式，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介绍西方社会学家是如何分析百姓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事物的方法，学会理性地、辩证地理解和分析当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使本书通俗易懂，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尽量减少使用深奥的专业术语和说法。因此，有的地方可能会显得不够专业和严谨。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翟福军先生的支持、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第一版于201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时作者对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改，增加了曾被删去的内容，书名也做了相应的变化。☞

## 结束语

本书会给人一种意犹未尽、戛然而止的感觉。这是因为，社会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不可能在一本不到13万字的书里讲述清楚。如果一本书能给读者留下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疑问和更多的猜想，未必不是一本好书。我们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期望引起读者对社会学的兴趣。如果通过阅读本书，您对书中提到的社会问题及有关的社会学理论有了一些兴趣，希望能更多地了解社会学，能进一步做一些研究，那么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学会理性地分析和理解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

【书摘】

## 官僚制度利大于弊吗？

背景资料：2012年12月，海军某仓库业务处干部带人维修电话线路，要战士小王买10米电话线，承诺找他报销即可。数日后小王来到机关，找到这名干部递上发票。谁知这位干部眼皮没抬一下，说道：“钱太少了，过几天再说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小王再次来到机关，找该干部时，被告知出差，过段时间才能回来。战友们说，钱不在多少，自掏腰包不算个事儿，总得要讨个说法。后来小王又一次敲开机关财务办公室的门，想问问能不能有别的办法。一名干部扫了一眼发票，一脸不耐烦地回道：“这点小事，三天两头问，我手头上的事儿还多着呢…”到第二年的3月，小王再次来到机关。业务处那名干部出差已回，却说：“这点钱，我怎么好意思找领导开口”。一名战士为报销18元钱，跑机关四趟，碰钉子四回，前后历经近三个月，最后在上级的干预下才得到解决。

普通百姓常把政府或大公司与官僚机构联系在一起。谈到官僚机构，人们免不了会联想起官僚主义。以上背景资料中提到的事情是官僚主义的明证。

有人说，“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中国的官僚制度，产生于古代大一统的专制国家，从战国开始，随着各诸侯国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中国的官僚制度开始成形。到了汉朝，官僚制度形成气候，成为君主巩固中央集权的工具。

中国官僚制的社会基础是等级制和世袭制，其实质是按人的身份差别区分官僚等级，建立在法外特权的基础上，归根结底是人治型。工业革命前的官僚制度变化并不大，这是由于建立起来的官僚文化并不注重效率，只注重维持统治。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西方国家出现了现代官僚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组织形式。它建立在专业分工和理性的基础上，排斥情感因素，以社会平等为前提。官员的级别差异，来自于知识和技能的差别，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有的人提出，中国的官僚制和西方的官僚制不是一回事。

官僚制度是一种理性化设计的科层组织机构，协调众多的人员进行有效的管

理工作。为什么官僚制度效率高呢？这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官僚机构具有专业化。例如美国的能源部专门管理能源事务，前能源部长朱棣文是一名华裔物理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美国的司法部专管法律上的事情，雇有大量的律师。律师个个是专才，有的精于打击欺诈，有的专攻反托拉斯法，有的善于处理破产案，有的专门负责儿童保护事宜。

其次，官僚机构是层级体制，所有岗位遵循等级制度的原则，每位职员受到上级职员的控制和监督。职员地位依照等级划分，下级对上级负责，服从上级命令，接受上级监督。但是上级对属下的指示与监督，不能超过规定的职能范围，上级不是太上皇，不可以胡作非为。上级在职权范围内可以命令下级，但是越出职权范围，下级可以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

第三个特点是官僚制度以理性、法理为基础，依法办事。官僚制度活动是由一系列规则控制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是机构的最高权威，任何组织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美国总统尼克松涉入水门事件违法了，尽管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美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但是美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凌驾法律之上，他不得不辞职黯然下台。

第四个特点是非人性化。官僚机构要求官员在处理公务时公私分明，排除个人感情，尤其是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

第五个特点是量才用人。官僚制度里的用人根据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资历，不得任意解雇，升迁按个人的工作效绩而定。

美国的总统四年一任，内阁部长们随着总统的上下台，像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但是副部长、处长、科长和科员却相对稳定。部里各局、各处、各科的职员有固定的职务分配，每个人有明确的权力和责任。这些人具有熟练的专门技术，真正具体办事还得靠他们，新来的部长仅仅掌握大方向而已。部长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听从技术官僚的意见。

这一现象有点像一艘万吨游轮，总统是船长，各部长是大副、二副、轮机长，政府的工作人员是船员，民众是乘客。尽管船长负责驾驶万吨轮，有权决定具体的行船细节，但是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万吨轮的航向。船长私自改变航向的后果是严重的。2012年1月13日，意大利邮轮在该国西海岸附近触礁翻倾，造成十多人死亡，二十多人失踪。事故原因是船长擅自改变了航向。

多年来美国进行总统竞选时，候选人总是拿中国的关系说事，他们常常说一些过头话，向选民保证，如果他上台一定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中国人千万不要当真。因为等到他真的上台当了总统，他的那些话是无法完全兑现的。外交政策不是一个总统可以说了算的，是由许多专家商定的。克林顿竞选时狠批老布什对付中国的手太软，扬言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上台后，二话没说顶着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力主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比老布什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僚制度设立的路线是不能轻易改变的，总统和部长尽管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不能背离官僚制度设立的规章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国家的运行有条不紊的原因。

虽然官僚制度有这么多优点，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僚制度过分强调机械性的组织层面，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层级节制削弱上级与下级的互动，导致官僚机构在处理事物时出现处事僵化、缺乏人性的现象。

第二个缺点是本位主义严重。官僚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官僚集团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增加个人利益。在科层结构中，信息自下而上流动，庞大的中间层减缓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官僚制政府各部门之间很少能进行横向沟通、信息共享，政府系统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的信息孤岛。这是美国反恐机构未能及时破获 911 事件预谋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缺点是浪费和低效。如果一项工作只需要半天完成，官僚机构的人会用一天的时间来完成只需半天可以完成的工作。

第四个缺点是官僚惰性。成立一个机构容易，但是要撤消一个机构就不那么容易了，有时一个机构会尾大不掉。

第五个缺点是官僚制会变成寡头政治。官僚制度强调科层制，强调下级对上级负责，所以官僚制度缺乏民主，导致少数人大权独揽。特朗普上台后多次解雇了政府部门的要员，因为他们与他意见不合，他不能容忍。❏

【书摘】

## 西方为什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

背景资料一：1991年12月25日晚，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饰有镰刀斧头和红色五角星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宣布了苏联历史的黯然结



束。存在了整整 69 年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

背景资料二：1890 年，美国取代英国第一次成为世界制造业老大，美国的 GDP 以每年 6.8% 速度增长。二战后期美国的工业发展达到顶峰，尽管目前老大的地位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其经济实力仍然是世界第一。100 多年前，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 22 美分，年收入大约在 200 美元到 400 美元左右。美国人 2002 年的平均年收入是 36,764 美元，考虑物价指数的因素，现在美国的人的平均薪水是 100 年前的大约 5 倍左右，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改善。1950 年，美国人有 50% 以上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到了 2000 年该比例提高到 66%。汽车的普及率则更高，2007 年达到平均 10 人有 9 辆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有 170 多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曾预言，资产阶级必将灭亡，无产阶级的革命必将胜利。在这 170 多年中，无产阶级革命曾出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曾经给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不幸的是，前苏联在近 30 年前黯然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空前的挫折，只剩下了中国和朝鲜等少数国家仍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

更让人失望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在西方国家没有实现。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的那样，组织起来去推翻资本主义。如背景资料二所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走向灭亡，相反仍然不断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的一些人士分析原因，认为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不断减少，已经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传统的产业工人不能代表所有的被剥削阶级，所以需要自我完善，与其他被剥削阶级联合，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完善，没有吸引力。还有人认为，西方现代民主政体的国家，不得不服从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革命要求在聚集到能够爆发整体性暴力行动之前，就足以使国家发生改变，所以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了。

西方社会学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西方国家发生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资产阶级的分散化。自从马克思逝世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不再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十九世纪时，美国的许多大公司属于家族式企业巨头，例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铁路大王古尔德、金融业大王摩根和钢铁业大王卡内基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人物。然而现在的大公司却由无数手中持有股票的股东们共同拥有，例如零售业巨无霸沃尔玛、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壳牌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BP）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再也不是某个家族可以拥有和掌控的了，而是由无数股东拥有。沃尔玛公司的股份据说有 100 亿，售出的股份达 50 亿股（也有说 36 亿股）。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独自拥有这家公司的股份。这些公司每天股票的交易量达到成千上万股，所以要搞清楚这些公司的拥有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与这些群体拥有的大公司同时出现的，是一大批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并不拥有多少股权，却凭着管理技能为广大的股东掌管着公司。中国人常用打工皇帝来形容他们，他们的薪水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根据一份 2010 年的 CEO 薪水报告，美国 10% 最大上市公司的老总们的年收入的中值数是 1,020 万美元。中值数的意思是，百分之五十的人高于此数，百分之五十的人低于此数。这些管理者尽管在公司中并不一定拥有多少股权，如此之高的报酬，使他们比马克思在世时的资本家更加富有。期望这些老总们和那些多少有些股份的小股东们起来造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是不现实的。

其次，蓝领工人白领化。一百多年前，工业国家的广大群众基本上蓝领阶层，在工厂或者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对比 1910 年和 2000 年，美国的技术人员的人数翻了两番，是以前的四倍，美国的制造业大幅度地萎缩，白领工作大幅度增长。白领工作主要指的是脑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如营销业人士、管理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

虽然有些办公室的工作与蓝领工作的待遇差不多，但是给人的感觉不一样，白领的社会地位毕竟比蓝领的高。有调查显示，许多低层的白领工作人员，自认属于中产阶级，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社会地位高。由于这一原因，西方国家的贫富差别现象被掩盖了，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穷人和富人严重对立。西方国家常常说，他们的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小，意思是说，西方国家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穷人和富人是少数。

第三，民众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尽管西方国家经历多次经济危机，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是得到改善的，背景资料二所列举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西方国家有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处在贫困线上的穷人的生活，比起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穷人的生活要好得多。在美国住别墅式洋房、开小汽车的人们，有不少是汽车流水线上的装配工、工地上出苦力的建筑工人和餐馆里的服务生。

虽然西方国家工会的势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但是工会在为工人提高福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工会时常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解决劳资在福利待遇上的纠纷，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工会一声令下宣布罢工，资方还真没有办法，严重的时候，连总统都不得不出面来调解矛盾。

列宁曾说过，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产生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资产阶级不在乎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即工人贵族们，使他们背叛广大的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他们引领工人阶级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列宁在这里提到了资产阶级的收买问题，如果被收买的不是少数工人贵族，而是广大的工人，那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就要小得多。

第四是法律的保护。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逐步拓宽了为工人提供的法律保护，工人可以更多地利用法律，为自己争得合法权益。西方国家有失业保险、伤残疾病救助、社会保险等措施，保障普通百姓的生活。在马克思时代，资本家是不愿负担这些措施的。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虽然西方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别，无产阶级革命迟迟没有到来是可想而知的。西方的社会学家很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一些修正。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财富占有的分析是正确的，目前美国私人公司中超过一半的股份，仍掌握在占人口只有1%的人手中。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资产阶级仍然把持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其次,许多所谓的白领工作的报酬,其实比100多年前的蓝领工作好不到哪儿去,尤其是办公室中的粉领阶层,这些人大多是女性,工资很低工作也很枯燥。第三,工会为工人争得了不少权益,与资方的定期谈判并不是没有劳资冲突,恰恰相反,正是劳资双方冲突的体现,只不过改变了形式,变得温和一些而已。这种冲突正是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提到的。最后,虽然法律保护了工人的一些权力,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巨大的贫富差别,在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利益方面,一般百姓与富人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坚持冲突论的社会学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西方国家出现,不能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和分析是错误的,西方社会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和不可调和的社会冲突,只是没有像马克思在世时那么严重而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西方国家出现,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存在着争论,到底谁是谁非呢?欲知正确答案,且看最后一章分解。📖

## 【目录】

作者前言

人为什么会犯罪?

死刑应该存在吗?

为什么会有富国和穷国?

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别?

教育是一种消费吗?

为什么会看病难?

世界人口会爆炸吗?

城市人口会永远增长吗?

男女平等吗?

女性在家庭中平等吗?

如何理解老龄问题?

青少年为什么会反叛?

为什么人会分成等级?

少数族群为什么受压迫?

宗教有什么作用？  
宗教会消失吗？  
人改变社会，还是社会改变人？  
有普世价值观吗？  
人能听从良知的召唤吗？  
垂帘干政有理论根据吗？  
官僚制度利大于弊吗？  
中国模特在世界舞台上？  
能经久不衰吗？  
同性恋的命运会如何呢？  
西方为什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  
为什么会发生社会运动？  
如何定义文革？  
为什么会发生骚乱？  
民众恐慌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社会变革？  
世界上有几种经济模式？  
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为什么社会学？  
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社会学有哪些重要的理论家？  
社会学家是如何搞研究的？

答案

结束语

## 【回忆文集】

## 《回顾暴风雨年代

## ——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

王复兴

## 编者前言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在众多校友的支持与鼓励下，现在与读者见面了。

2019年6月编者曾把《回顾》第二集捐赠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并收到了图书馆馆长南希女士（Ms. Nancy Hearst）给笔者发来电邮。现在《回顾》第三集，已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记

载保存毛时代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与思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所在。

本书第二集中，曾刊发北大哲学系教授李清崑老师的文章《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该文论述了北大从1957至1965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影响，论述了北大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与此前历届政治运动，特别是与社教运动和第二次国际饭会议的关系。该文引起美国学界的重视，认为它详尽、真实地描述了文革前，北大叠加的政治运动及其影响。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李的文章重点描述了北大干部、党员、教师当年的政治生态，而对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涉及较少。为补足这一点，第三集刊发了北大数力系59级（65届毕业生）学长徐明曜的文章《我的大学（1959—1965年）》。徐的文章写了1963至1965年北大清查、批判反动学生的情况以及本人被批判的遭遇。这使人联想到文革中，工作队“反干扰，抓游鱼”，批反动学生，以及文革后期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情景。文革的极端左倾机会主义是从17年发展而来的。挖掘文革的根源，势必会追索到前17年。

令人敬仰的丁石孙校长于2019年10月12日于北京病逝。为纪念丁校长，



第三集刊发了丁校长的两篇访谈录，一篇从1950年谈到1965年的北大；另一篇谈文革中的“黑帮大院”。丁校长的学生与朋友武际可的文章《吹尽黄沙始见金——忆丁石孙老师》，记叙了丁石孙的一些事迹以及他们二人的多年的师生情谊，从中折射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在刊发的北大校友悼念丁校长的诗词中，署名“未名1988全体同学”一副挽联颇用心思，该挽联中套联，工整对仗中嵌入：“曾有丁石孙，燕园于兹多风骨。但悲天地人，君子从来稀世出。”说丁校长乃“稀世风骨”，当是很高评价。丁校长于1989年时对学生宽松，风波之后请辞校长之职。

本文集有一组文章是围绕有关历史系著名教授周一良先生的话题。“梁效”写作组是北大文革后期极其重要的事物与事件，“梁效”作为“四人帮”的御笔，曾对文革后期全国的运动产生过全局性的恶劣影响。周一良曾是“梁效”的重要成员，并曾因此身份荣登“中共十大”主席团座席。“四人帮”倒台后，周先生被批判、审查两年多。他本人“悔恨交加”，写了大量检查，并于1987年向北大党委副书记郝斌提出“退党”的要求。郝斌为保护他，没有向党委汇报。季羨林则劝周：“都入了，就别退了。”

党对知识分子先改造（洗脑），而后团结（以地位、高薪、大宅拉拢），最后使用（利用）的政策，是1950年之后的一个系统工程，其中背叛师门，批判“师道尊严”，批判师长，是“转换”思想（洗脑），从而达到“脱胎换骨”的重要手段。通过批判师长，与旧的思想体系决裂，用马、列、毛的新世界观武装头脑。文革中，我们看到中学生斗老师、打老师，甚至发生名校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校长的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发生的根源何在？周一良在改造思想的历程中，也曾“深刻”地批判他的老师胡适、陈寅恪。以至于陈寅恪先生与此弟子“断袍、割席”。周先生晚年自嘲成了“梁家子弟”（梁家指梁效），豁然反省，十分悔恨。周一良后半生的内心痛苦，反映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磨难。

本文集首篇文章是郭罗基先生的力作《“梁效”顾问冯友兰》之节选，也是谈“梁效”。“梁效”在文革中后期独霸文坛，在全国放毒、肆虐时，“老五届”们早已离开了北大，对它缺少真切的了解。郭罗基老师在北大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与迟群、谢静宜及“梁效”们做过斗争。“四人帮”倒台后，郭罗基亲历了对“四人帮”的鹰犬迟、谢及“梁效”的群众性揭、批、查活



动。郭本人保存了大量审查“梁效”的资料。郭文详尽地记述了迟、谢把持的“梁效”是如何诞生、发展、做恶、灭亡的全过程，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郭认为，对“梁效”现象应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对其应作“个案的剖析和群体的考究，目的不是整人，而是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和知识分子精魂的重塑。”

郭先生引述周一良为自己辩解的说词：“事情放在较长一段流光中来考察，就能较为超然，就能较为公正，就能实事求是，就能通情达理得多。”郭接着对此点评：确实，对“梁效”的研究要把它“放在较长一段流光中来考察”，不是如周一良所说的四个“就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洗刷，而是更能看清楚对“中华文化品格”的戕害和对“知识分子精魂”的糟蹋。郭老师总结道：“梁效”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它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现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为什么容易出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耻之徒？特别是具有“五四”传统的北京大学，何以又出了一个反“五四”传统的“梁效”？此类问号，宜长留人间，深思之，怵惕之。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任瑚琏所写关于当年“新北大公社”文艺团体“胜利团”的历史，对研究北大文革史、文革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文革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文艺状况，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外，任瑚琏保存的“胜利团”史料、剧照、乐谱、节目单等珍贵资料已交给编者转交、捐赠、保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档案馆之《王复兴专档》内的《胜利团卷宗》（《李锐日记》便是保存于此胡佛档案馆内）将来有人要研究“胜利团”，便可参照任瑚琏在本书中的专文，研究有关档案资料。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孙月才的文章《告别盲从 走向精神自由》总结了本人从文革时的盲从，到文革后的幡然醒悟，走向精神自由。从而独立思考。文革后他与周扬、王若水共进退，在“人道主义”“异化”等议题上与左王邓力群展开论战。孙月才的思想转变具有典型意义，反映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文革期间关于北京天派、地派两派争斗的提法是中央文革的说法，并不准确，文革后聂元梓、王大宾都否认北京市的派系争斗焦点是天、地派之争。胡宗式的《文革期间北京市两大派的争斗》一文，指出在1967、1968年北京发生的两大派争斗，主要是“新北大派”与“师大、学部派”的两大派争斗。天上的“北航红旗”与地上的“地院东方红”也并非主角。胡宗式对当年北京两大派争斗的全

过程，有清晰的记叙，较为符合历史事实。胡宗式学长文革期间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并负责发行《动态报》，他受聂元梓、校文革委托负责校外运动，文革后仍保存下来大量当年的动态报资料，因此他所回忆、整理的当年（一月风暴之后）北京两大派争斗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与史料价值。

吴乃龙的《关于“712”陈必陶大字报》、章铎的《电话采访李清崑》、何子溪的《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谢甲林的《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王复兴的《北大文革中的几个问题》等文，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北大文革不同阶段的历史。

最后要感谢北大国际政治学院印红标教授，同意将其力作《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作为本文集的《序》。该文揭示了在文革的前半年，最高领袖对文化大革命，分三个阶段，进行了三次发动，步步升级，最终指向了文革的目标：打倒刘少奇，推毁刘邓司令部。☐

2020年1月17日

于美国德州奥斯汀寓中

## 【文选】

### 孙蓬一和北大文革（节选）

王复兴

《记忆》于2015年11月15日第143期刊登了常风先生《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和评价人物——评章铎女士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孙蓬一〉》。章铎的这篇文章是于2015年9月15日发表在《记忆》第139期。两篇文章都谈到北京大学文革历史。常文题目的正题“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和评价人物”是个非常好的命题。对于我们每一位文革亲历者来说，在回顾并评价文革历史时，都应尽可能努力地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真相及评价历史人物。唯有这样，才能通过众人的努力，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使人们得到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而有助于当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笔者做为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革中在北大经历了三年又九个月，愿与校友们共同追忆、切磋、反省那暴风雨的年代，为后人留下点滴历史的“碎片”。为此，

笔者也来谈谈我记忆中的北大文革史的一些片段以及对历史人物孙蓬一的评价。

## 一、关于孙蓬一的性格

章文在“引言”中提到孙蓬一的性格，说“他直爽、热情、有胆有识，我和好多同学都喜欢他。”

常风认为在评论历史人物时，讲人物的品德、性格意义不大，主要应看其政治行为。对此，笔者与常风有类似看法，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主要应看他对社会进步起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还是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面作用。品德、性格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因为有时好人也会办坏事。而某些奸雄，也可能对历史前进做出贡献，如曹操。但由于章文是以个人史为中心，记述了孙蓬一长达40多年的个人命运。而性格决定命运。因此了解孙蓬一的性格特点，也有助于理解他多彩而又起伏的命运。章铎所说的孙蓬一性格特点，确如其人，但不够完整。例如：“新北大公社”总部成员黄树田大约在1968年初的一次“公社”内部串联会上，公开批评本派领导孙蓬一“刚愎自用”。在1969年夏季的一次全校大会上，8341政委杨德中做报告，孙蓬一闯主席台，孙对杨讲，他对迟群有意见，对北大运动有意见，对迟群批判自己有意见。杨德中当场批评孙：“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再如聂元梓曾多次对周围的人批评孙蓬一“鲁莽”。

“刚愎自用”“固执”“鲁莽”，这些负面的性格特点也是我所了解的孙蓬一的特点。了解孙的这些性格，有助于理解他在文革中的行为。笔者在文革中是“新北大公社”一员，我对孙蓬一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他择善固执，有胆有识，敢于冒巨大风险，反王、关、戚，反谢富治。但不喜欢他择恶固执，把“井冈山”群众视为错误路线的“敌人”，把本派不同意自己的人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并自以为是“善”（捍卫毛主席革命线），固执地反对大联合，甚至指挥武斗。

## 二、比较常、章二人文章的异与同

常、章二人对北大文革史的不同看法，主要集中于各自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是1966年10月至1968年8月这段历史。而1969年3月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校之后的历史，在两人各自文章后半部分，看法较为接近。例如，常文确定

“孙蓬一不是 5.16 分子”，推翻了迟群及后来北大党委对孙蓬一的定性及不实之词。而章文则更鲜明地指出“1969 年迟群、谢静宜之流进驻北大后，他（指孙蓬一）一直被打成反革命而被长期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劳动改造……长达八年之久。”这显然是践踏人权的典型事例。两人均认为 8341 把孙蓬一打成“5.16 反革命分子”是冤案。那么章铎从这点出发，对孙表示同情，应是在情在理之事，无可厚非。

从 1967 年 1 月至 9 月这段北大文革史，章文提供的史料十分丰富。而“论从史出”应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论点应出自史料。章文列举了大量史实，述说了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来龙去脉，比较有说服力。

常风在文中对 1966 年 10 月到 1968 年 8 月这段北大文革史，加叙加议，涉及许多北大文革史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笔者愿意与常风先生共同切磋、探讨。

### 三、孙蓬一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笔者认为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错误是，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左倾的立场出发，反陆平、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批“资反路线”、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孙蓬一在文革之初被调到中央文革办公机构，1966 年 10 月在聂元梓要求下被调回北大任校文革常委，负责学校运动。1967 年 3 月孙升为校文革第一付主任。孙是做为陆平党委对立面进入校文革，并参与组织了多次对陆平、彭佩云的批斗大会。1966 年 11 月 19 日，聂元梓、孙蓬一，在毛泽东通过李讷的指示下，去上海串联，炮轰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资反路线。

对孙蓬一坚决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这一主要错误，常、章二人的文章都语焉不详。章铎在史料中一带而过，没有十分明确的评论。常文则侧重孙的主要错误是对邓小平的态度。指出，一是：孙蓬一签了那张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 年 10 月 1 日后《红旗》杂志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大学生都明白这是指向刘邓路线。11 月全国形成批资反路线高潮。在 10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检查。邓的检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因此 11 月 8 日聂、孙等 11 人所贴批邓的大字报并无轰动效应，影响有限。常文第二点是指出：邓朴方被批斗至残一事似与聂、孙有关。常文写道“邓朴方经过

严刑逼供、威胁，被逼跳楼，至人终生残疾。”“聂元梓和孙蓬一犯下的这个错误可以说是他们所有错误中最致命的。”并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在文革后被判刑的主要原因。”常风的意思，是由于文革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而邓朴方是邓小平至亲至爱的亲骨肉，因而聂、孙获罪与“邓核心”的“心结”有关，常风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后来被判刑的“最致命的错误”。这一看法与民间许多人的看法近似，有一定道理。先不论聂、孙获罪、判刑，是否源于个人恩怨，是否公道，是否领导人的报复心理所至。聂、孙在文革的最大错误应在政治方面认定，他们在文革初期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坚决与刘邓“资反路线”斗争，这应是他们在文革初期（主要是从1966年5月25日到1967年1月这段时间）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这也是当时北大99%的师生，不论是那一派，共同的政治倾向，都是政治不正确。

关于常文说邓朴方“被逼跳楼，至人终生残疾”，把这笔帐标到聂、孙头上，是有违事实的。

首先邓朴方受伤至残的时间是1968年8月31日。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从即日起聂元梓、校文革被工军宣队全面夺权。邓朴方受伤至残是8月31日，这时是工军宣队主政，聂元梓已失去自由被审查。邓榕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明明白白写道：“8月末的一天，哥哥邓朴方，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邓榕写的是“8月末的一天”，并写了受伤是因为“跳楼”，而不是因“严刑拷打”受伤。邓朴方受伤至残确实与聂元梓、孙蓬一无关。邓榕的“跳楼”之说较接近事实，但不够准确。事实是，邓朴方是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当时他被关在北大东门外物理楼四楼一间房里。邓朴方想逃走回家。在8月31日晚上，他沿着外墙的下水道水管从四楼向下攀爬。由于水管年久失修，已经朽了，他抓着水管爬时，水管断裂，结果他摔了下来，脊柱受伤，至残。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得到学校通知后，立即赶到出事地点，邓朴方躺在地上，赶来的同学看到四楼一个窗户大开，邓朴方用手指，指着四楼，意思是他从四楼那个窗爬出来，摔到地上。同班同学李佳林等三人把邓朴方抬上三轮平板车，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抢救。抢救邓朴方的同班同学李佳林的文字材料证明，邓朴方“并非自杀”“也无人推他。”李说事发时间“是68年8月底，邓爬‘下水流管’，想回家，并非自杀，否则头朝下……必死无疑！他身体很棒才敢爬‘下水管’，



用腿夹着，不知道在二楼还是三楼倒手时腿没夹住，后仰落下地面，后背着地，才会震断脊椎中的神经。当时我们班三人用平板车（有我），推他去了北医三院。”

（见李佳林《未名湖畔六载风雨情》附录，刊于《回顾暴风雨年代《第二集》329页）。邓朴方本人从来没有讲过他是被聂、孙派人“严刑逼供”“被逼跳楼”，也从末如此作证。常风所言不实。

#### 四、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到上海串联

常风写道：“1966年11月19日，聂元梓与孙蓬一等人秉承江青、王力旨意，到上海煽动造反派批判曹荻秋、杨西光等，并把常溪萍拉到会场批斗。”此处不够准确。事实是，聂、孙去上海串联，首先是直接秉承了毛泽东主席的旨意，江青、王力只是遵照毛泽东的旨意，随后跟进、执行、落实。

1966年11月12日、13日，李讷（毛泽东女儿）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单独谈话。13日，李讷对聂元梓讲“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联。”“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是你北大搞也不行。”“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希望你们做出成绩。”（引自《聂元梓回忆录》第十章第一节）李讷12日、13日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当时办公室人员及校文革常委都看到了。14日，聂元梓召开校文革常委会议，传达了李讷的谈话及毛主席的指示。对这个背景，有个重要旁证，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一书中指出“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联成一片。”江青、王力是在毛泽东通过李讷直接对聂元梓做了指示后，跟进、执行。江青告诉聂元梓“用北大群众组织名义去上海。”

章铎文章中，对李讷到北大传达毛泽东要聂去上海的旨意，引述了李清崑的旁证。李清崑说“那天（1966年11月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6院二楼组织组，我、孙蓬一、夏剑豸、陈葆华、付治文都在那里，聂元梓当时不在。她（李讷）给我们说‘你们不要老盯着北大，要放眼全国。我们了解，现在上海的造反派受压，主席想让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援上海的造反派，我这次来就是谈这件事。’第二天13日李讷又单独与聂元梓谈话，传达了毛的旨意。14号聂元梓召集校文革常委会议，传达了与李讷的谈话，研究、布置了去上海串联一事。此事有许多旁证，证据链完整。李讷文革后对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否认此事，但这不是李讷想



否认就否认得了的。这一史实的重要性在于，这对了解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很重要。1966年11月，毛泽东已把目光投向上海，要把北京、上海的造反大势联成一片。尔后到了1967年1月，毛泽东便从上海引爆了一月夺权风暴，以华东影响全国。毛泽东于1966年11月让聂去上海，那是他下的一步棋。其实无论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聂去上海造反，或是江青、王力指示聂去上海，这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中央文革是毛的文革办事处，执行的是毛的文革路线及有关部署。而无论是李讷或是江青传达毛的旨意要聂去上海串联、造反，聂、孙所犯错误的性质也是同样的，其错都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的政治、思想之错。但问题是按照1983年《人民日报》所宣传的那样，认定聂、孙去上海串联、造反，炮轰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其性质是“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那么，“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谋、主犯是谁呢？

在1966年9月至12月，北大两派学生99%都出去到全国各地串联过，外出的学生到了外地（包括上海），99%都是造反派，“炮轰”“火烧”各地省、市委，批判“资反路线”。在外地，北大两派学生没有分歧，十分一致。学生们并不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是在《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炮打司令部》等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引下，去捍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生们因幼稚，跟着党犯了错。这是当时的大气候、大潮流，聂、孙去上海造反之错，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大潮流之下，犯的政治思想错误。

## 五、关于1966年“井”“红”的政治倾向

常文说1966年“在北大出现了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的怀疑反对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群众组织和学生。”笔者认为这个论断的后一半是符合事实的，即“井”“红”是反聂元梓的群众组织；而前半论断说“井”“红”反中央文革是言过其实了。“井”“红”什么时候反中央文革了？常文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北大的“井冈山”“红联军”出现在1966年10月至12月，其纲领很明确就是反校文革、反聂元梓，而且是站在比聂元梓更左的立场上反对聂的左，嫌聂不够左，批聂右了。说聂是“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杨勋大字报语）。认为聂不够左，不够革命。

北大第一次分裂始于1966年10月6日。这一天出现了二份反校文革、反聂

元梓的大字报。随后很快诞生了“井”“红”。那是前后一致的反聂思潮。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观点和倾向。

10月6日，物理系路远、周闯贴出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大字报批判聂元梓主张斗黑帮要文斗，不要戴高帽、不要搞喷气式，是“温斗”。批判聂元梓不同意成立红五类子弟协会而“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同学”，不满聂元梓不搞血统论。他们的目标是北大必须再次“乱”。追求的是个“乱”。

同一天，经济系杨勋也贴出大字报，批判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路线。”杨勋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们站在“左”的、“激进”的立场，指责聂元梓、校文革是“右”，是“保守”。他们反聂是反聂之右。

随后有许多大字报响应路远、周闯及杨勋。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毛泽东主义兵红卫”也亮明了反校文革、反聂立场，他们认为聂元梓不够左。随后不久出现的“井”“红”也持同样观点。同时，出现了许多反击反校文革、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派大字报认为，主攻方向是李雪峰、张承先的工作组错误路线，而不是反陆平、反工作组的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聂元梓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派学生后来组织了“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等红卫兵组织。

常文以生物系学生樊立勤为例，想说明“井”“红”这一派学生反中央文革。其实樊立勤并不是“井”“红”成员，但他的观点与“井”“红”是一致的。1967年1月6日，樊立勤在大饭厅的辩论大会上，批判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丝毫没有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是樊的基本政治立场和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樊要抢占的政治正确至高点，正是中央文革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樊立勤不是张志新，不是王申酉。他在紧追文革的大潮流，要求校文革更左。

1月19日，樊立勤贴出一张大报《康生是什么人？》似乎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

樊立勤在大字报中批判康生搞“封、资、修”，揭发康生参观潘天寿（著名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院院长）画展，并题字“画坛师首、艺苑班头”。文革时潘天寿被打成“反动权威”“反动画家”。陈一谔在其《回忆

录》中对同一派的樊立勤的此份大字报的评论是：“他贴康生的大字报，是认为康生左的还不够。”陈一谔说“我对他许多过于极端的痞子想法和厚黑作法并不苟同。”（《陈一谔回忆录》113页）樊立勤炮打康生的目的，是因当时北京高校、中央党校有股反康生的风潮，他是想赌一把，如果康生倒了，正如他曾对同伴讲的“康生是聂元梓后台”，（樊的根据是聂元梓曾按照康生指示把经济系教师杨勋押送去公安部，当时周恩来也做了相同指示），这样聂元梓就得垮台，证明他樊立勤一贯正确。新北大公社也会跟着聂垮台、解散。正如樊立勤在后来5月17日成立“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时的《宣言》所言，他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的矛盾是路线斗争，声称“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观察、对待校文革和“公社”的群众。《宣言》说新北大公社“是大杂烩”、是校文革的“御用工具，矛头指向了几千名师生。《宣言》说“校文革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要与聂元梓的资反路线斗争到底。所谓资反路线即严重的右倾路线。聂元梓反陆平、反工作组、到上海串联反上海市委、这明明都是过左，樊立勤却把聂的左当成右来批，他岂不是更左？1967年的北大，左倾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大潮流。樊立勤并没有反潮流，而是顺着潮流在浪前飞跑，左得很。

樊立勤是生物系学生，在北大文革中很活跃。校文革因其坚定的反对校文革立场，曾长期对其打压，并纵容“校文革专案组”的对其关押、殴打，受重伤。这是聂、孙、校文革的一件严重罪错。对樊立勤的这一不公遭遇，笔者深为同情。

常文说“井”“红”反中央文革。1967年9月7日“井冈山”出版的《新北大报》，刊登编辑部的文章：《粉碎二月复辟逆流，恢复“井”“红”本来面目》，该文写道：“‘井’、‘红’在十二月份顶恶浪、战黑风，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明确地讲到“井”“红”在1966年12月，是“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而不是反对。应当说当时有这样的态度是正常的，两派绝大多数人当时都是这样对中央文革表态。引用到这里，只是证明常文所言不实。

## 六、关于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王、关、戚

章铎一文用大量史料叙述了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王、关、戚的来龙去脉。常风不同意章的观点，认为：章铎讲“聂、

孙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反潘、吴就是反对王关戚，反王关戚就是反‘四人帮’。这是不能成立的。”章的观点能否成立，要看史料。首先，章文所叙述的史料，多处讲到聂、孙、直接反对王关戚的事实。其次，反吴传启是否就是反王关戚，这取决于反吴传启与反王关戚的内在关联。章认为潘、吴搞极左，结党营私到处夺权，而王关戚支持他们，是潘、吴后台。当时公开反中央文革大员不可能，因此为着缩小风险，不能直接、公开反王关戚，便通过反潘、吴，来反王关戚，抵制极左路线。这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但章文有个概念不够清晰，章文说反王关戚就是反“四人帮”，把王关戚与“四人帮”画上了等号。“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泽东于1974、1975年几次批评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在第十届中央政治局中搞小宗派时说的，特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日报》的文章及一般群众时常把“四人帮”的概念扩大到文革中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估计章铎应是因此之故，把“四人帮”与中央文革等同视之，其说法不够严格。但从实质上看，聂、孙、“公社”群众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客观上就是反了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只是主观上并不自觉，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主、客观对立，因为认识需要经历长过程。

常风认为“新北大公社”、聂、孙反潘梓年、吴传启不等于反王力、关锋。事实是：新北大反潘、吴与反王、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学部联队潘、吴搞形左实右，得到了王、关、戚、谢富治的支持。而聂、孙、“新北大公社”反对潘、吴搞形左实右，也就打击了潘、吴的后台王、关、戚、谢，并且会自然上升到直接反王、关、戚、谢。这就是政治斗争的逻辑，并已被大对量史料所证实。

1967年1月至4月的一连串社会冲突事件，表明聂、孙、“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已从反右转向主要反左，从反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走向反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关、戚、谢富治。孙蓬一的“4.12”演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4.11”地派六辆宣传车闯入北大挑衅后，北大师生群情激奋，孙蓬一于4月12日在大饭厅召集“新北大公社”全体大会，并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是反极左、反吴传启的宣战书，不指名地抨击了学部联队一派的后台王、关、戚。孙在演讲中说“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

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孙指出他们的手法是“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指出他们在搞小圈子，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到处伸手夺权。孙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显然不是指吴传启等人，他们不够资格、不够份量，而是指“大人物”王、关、戚“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常文说潘梓年在文革后获得平反，证明历史清白。但这并不能证明当年学部联队潘、吴一派跟着王、关、戚跑，搞极左，到处向中央夺权就是正确的。潘的历史问题并非当时两派斗争的焦点。

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北航“红旗”韩爱晶在1967年2月至4月这段时间对“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民院“杭大公社”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洪涛，是持观望态度。到了5月，老蒯、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启的行动。其实所谓的“天派”“地派”并不是阵线很清楚的两派，地院“东方红”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被人当枪使了。真正对立的兩派，是派中之派，一派是学部联队、一派是新北大（口头叫法）。学部这派有吴传启控制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洪涛控制的民研所“红色联络站”、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延安公社”、谭厚兰控制的师大“井冈山”。他们听命于《红旗》的林杰。这个小圈子的行动相当一致，口号、行动都很左，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到处伸手抢权。一旦有什么冲突，王、关、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新北大这派有：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人民日报“井冈山”王若水、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阮铭、民族学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这派的共同特点是：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对谢富治强烈不满，对“二月逆流”的几个副总理“一批二保”，反对打倒。坚决保周（周恩来）。新北大当时成了反极左、反王、关、戚的中心。新北大得到了军队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派”对立面）的支持，聂元梓与高等军事学院的“红高联”有密切联系。新北大派在1967年5、6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攻势（此时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参加了进来），极左派就全线震动，王、关、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施压无效，于是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陈伯达在6月5日深夜到北



大讲话，接着对“红代会”讲话。两次讲话抡起大棒，狠批聂、孙。6月5日之后，北大反对派“井、红、团、零、飘”出世。应指出的是，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在校外，而不是对内，是层层向上，矛头向上。斗争方向是反极左。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是冒着巨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王、关、戚。这便是1967年北京两派斗争的全局概况。

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极左，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北大文革史的一大亮点。新北大当时已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党、政干部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政治倾向重点不是反右，而主要是反左。1968年3月2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打倒杨、余、傅。首都红代会代表列席了会议，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会。江青在大会发言中说“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并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反左。”第二天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传达了“3.22”林彪、江青的讲话。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倒杨、余、傅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时，又一次公开批评聂元梓反左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就在江青多次批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那段时间，聂元梓在俄文楼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引自《聂元梓回忆录》中《我的上诉状》）这证明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极左已上升到相当自觉的状态。而当年新北大这种反左的立场，是上下一致的，例如“新北大公社”的“红梅战斗队”就曾于1967年5月底贴出过一份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指出反极左是斗争大方向。把“极左”加上“反革命”的冠词，是暗指林杰、关锋是吴传启后台。今天反思文革，当年反左无疑是个正确方向，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新北大坚持反极左，是朝着正确方向逐步觉醒。他们当年虽然出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也跟着潮流反右，批判走资派，打倒刘邓，但头脑中的兴奋点与实际行动中的用力点却是反极左，反王关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孙、“公社”群众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还跳不



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尽管在大的潮流方面，他们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拥护中央文革，批判资反路线，批判走资派，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但他们的主要倾向却是反极左，明反吴传启，暗反王关戚。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斗争只能隐蔽地进行，不可能直接反中央文革大员。正如文革后，于光远曾对郑仲兵说过：“孙蓬一这个人我还有一些印象，‘文革’中是他较早提出反对‘极左’思潮，提出王、关、戚，即中央文革问题，也是坚决和谢富治斗争的人……”（引自郑仲兵在纪念于光远座谈会上的发言：《回忆光远伯伯》，载于《往事》第126期2014年9月28日。）

## 七、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炮打谢富治

常文写道，孙蓬一在1967年的“4.12”演讲中“情急之下口无遮拦才喊出‘炮打谢富治’的口号。”常风强调回顾文革要“真实”地反映历史，这点确实很重要，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体现在真实的历史细节之中。笔者在“4.12”现场，不记得孙蓬一在演讲中“喊”过“炮打谢富治”的口号。为慎重起见，笔者查对了相关资料，找不到孙蓬一喊过这句口号的记载。这应是常风记忆有误。孙蓬一虽然对谢富治不满（因1月19日洪涛等人抢国家机密档案受到谢保护），但“4.12”讲话的锋芒并没对准他。而是针对吴传启及其背后的王、关、戚。但“4.12”讲话从情绪上激发了北大师生批极左派的斗志，引发了随后发生的新北大第一次炮打谢富治。新北大首次炮打谢富治发生在4月13日、14日两天。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大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说是解决“4.11”北大与地院的冲突。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胡宗式参加了会议。在接见会上，谢富治表面公允，不让北大和地院讲话，却让随地院到北大闹事的其他五个院校发言，结果北大成了挨批对象，被诬指“挑起武斗”。这明显不公平且颠倒是非。谢富治甚至单独对聂元梓讲“武斗是北大挑起来的。”消息传出来，北大师生议论纷纷，明明是地院等六校跑到北大校园闹事，并不是北大去了地院啊。怎么把责任推到北大头上？再说，北大也没人动手打人呀。那有这么不顾是非，拉偏架，偏帮地院的呀。这不是拉一派打一派嘛！13日晚上，许多学生自发地聚集到大饭厅议论谢富治对4.11事件中北大学子的批评，孙蓬一即席讲话，表达了对谢富治的不满，说他不公正，但也没有喊“炮打谢富治”。当晚及第二天北大许多

学生自动跑到市内贴大标语“炮轰谢富治！”等。还有一批人去公安部要和谢富治“讲理”。聂元梓听说后，赶紧派人去盖掉前面人贴的谢富治的标语（难免有漏掉的），同时派人去公安部把找谢富治“讲理”的学生拦住，劝回学校。这是13号晚和14号发生的事。这就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第一次炮打谢富治的情景。4月13日下午，聂元梓、孙蓬一在小范围议论，“看来谢富治和王、关、戚是一伙的。”（引自《聂元梓回忆录》），但并没有公开这样讲。

过了一、二天有人告诉笔者，城门楼上仍贴有大标语“新北大岿然不动！”大街上还有标语：“谢富治算老几？”“炮轰谢富治！”（署名新北大）。这应是漏掉、没盖上的标语。“4.12”“4.13”的事件，动静很大。

1968年举办北京高校两派学生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期间，聂元梓要批判王、关、戚，揭露他们分裂高校的问题，受到学习班领导（北京市革委会）的压制。聂元梓在学习班掀起新北大第二次反谢高潮，闹得全北京市都知道。

常风确认了聂、孙炮打谢富治的事实（只是具体过程有分歧），这也是当时北大两派及全北京市民都知道的事实。那么新北大反谢，对不对呢？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对聂元梓说：“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还有你派人到38军这事办的好。”这是有案可查的权威性证据。文革后聂元梓对人们说：“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

不能说当年凡是反谢就是正确，也不能简单地说反谢就是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要看是为什么。在1.15档案事件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北大人不糊涂。此外，吴传启在关锋、戚本禹的指使下，派了以周景芳为首的100余人进入市革委会和北京日报，与谢富治狼狈为奸。这是新北大由反吴传启进而炮轰谢富治的重要原因。周景芳于1983年1月被北京市委开除党籍。谢富治于1983年10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许多更严重的罪行被揭露。历史对此已做了结论。

## 八、牛辉林的“8.9演讲”

牛辉林这个演说的背景是，武汉“7.20”事件发生后，全国声讨武汉军区司员陈再道。《红旗》在“八一”社论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指出：“目前，全国正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后来得知，这个《社论》是林杰、关锋、王力起草。

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员令。在王、关、戚的煽动下，7月、8月二个月，全国曾爆发了“毁我长城”的反军高潮，全国很多省、市发生了部分群众冲军区，抢武器，批判“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甚至揪斗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风潮。这是王、关、戚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股极左思潮曾严重地影响到北大。

北大“井冈山”勤务组头号负责人牛辉林于8月9日在38楼东侧召集“井冈山”全体大会，做形势报告。牛辉林在演说中，分析全国的形势，极力夸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重、尖锐，举了很多全国各地军队镇压群众和造反派（按：指1967年群众组织重新分裂后的反军派）冲击军区、军队的事例。号召北大“井冈山”再次开始新的全国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去反“军内走资派”。下面是他演说的摘要（据油印传单记录稿）：

“66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李井泉警卫员已经揭发。他们曾经决定将兵变转到67年2月，所以有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军内走资派是二月黑风制造者。”“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说：根据陈再道过去的表现，知道他会暴乱。”“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在颐和园开秘密会议，陈毅秘书揭发的，说‘7.15’全国大乱。”“从此可以看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在密谋策划。”“通过几个月的支左运动完全暴露了军内走资派。”“军内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一个大转变。可以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造反派队伍。”“新北大公社在外面，支左还是支保？”“聂元梓公开支持‘保’字号组织，简直不能容忍。”“38军是坚决支左的。（暗示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而聂反38军。）“聂孙他们在校内外挑起武斗，企图在全市挑起更大规模武斗，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新北大公社是聂孙的御用工具。”表示北大井冈山“已走了1300人，我们在各地基本上有人了。”

以上是“牛辉林8.9演说”的摘录，占他全篇演说的大约五分之一的内容。他在报告里，小道消息猛忽悠。他的这个“演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他紧跟《红旗》社论，明确提出“军内一小撮”“军内走资派”；点了三个老师的名字：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说老师是“军内一小撮在密谋策划”什么阴谋；表示“井冈山”已有1300人到全国各地反军；攻击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支持保守派；重提陈伯达“6.5”讲话，说聂“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8月12日（“8.9”演说三天之后），“‘新北大井冈山’总部勤务员牛辉林在校内又一次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要‘揪军内一小撮’。”

牛辉林当时在北大，迎合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历史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对牛辉林而言，这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他是在紧跟《红旗》社论，认为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牛辉林毕业后在北大开展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时，被调回学校接受审查。他曾在大会上承认自己是“5.16分子”，其实他根本不是，后来证明是冤案，离校参加了工作。

“新北大公社”没有参与各地的反军活动（除了个别在外地没有及时撤销的联络站自做主张之外）。当时有谣传说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反38军，牛辉林也造这种舆论。聂元梓派“公社”总部负责人卢平和“除隐患”战斗队队长赵建文二人，为此专程去保定拜访了38军军部，进行辟谣，与38军首长座谈甚好。此事最有力的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毛泽东对聂元梓讲“你们拥军是对的”，“你们访问38军这事做的好。”这是有案可查的。

1967年8月，在那个炎热的盛夏，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全国阶级斗争的温度也达到了顶点，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高涨，到处发生抢枪事件和大规模武斗，运动严重失控。毛泽东为稳住军队，握牢军权，抛出了王力、关锋做替罪羊。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批示“还我长城”。并于8月26日指示杨城武回京转告周恩来关押、审查王力、关锋。对戚本禹暂时没动（想争取他回头）。

8月27日，与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来往密切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冲派的对立面）抄了林杰在《红旗》杂志的办公室。

8月30日，周恩来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揭批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反军乱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会议还批判了王力的“8.7讲话”是企图打倒陈毅，在外交部夺权。

9月1日，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公布了王力、关锋的罪行及其倒台。随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群众大会，公开了王力、关锋的罪行。陈伯达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小爬虫王力、关锋！”

9月，北京两派（指新北大派与学部联队派）斗争形势骤变，“学部红卫兵联队”、潘梓年、吴传启迅即垮台，吴传启逃跑，不久被北京卫戍区抓捕。周景芳（戚本禹安插在北京市革委会的秘书长）及潘梓年、林聿时、洪涛、刘郢、王恩宇都被北京卫戍区收监。

那时北大校园内的气氛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个个兴高采烈，许多人到海淀下“馆子”，聚餐，喝啤酒，特高兴。当时，聂元梓及“公社”总部三令五申，不许“公社”群众游行、欢呼、贴大标语庆祝，不许攻击“井冈山”。“学部总队”（学部反吴传启一派）到北大贴了大标语“新北大是坚定革命派！”“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1968年1月，戚本禹被关押、审查、垮台。1967年的极左狂潮画上了句号。

当年“井冈山”部分师生受极左思潮影响，反对聂、孙、“公社”反王、关、戚，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文革之后，“井冈山”师生对文革的极左思潮、对王、关、戚的极左路线，早已幡然醒悟，有了明确认识。

## 九、北大武斗

北大武斗，两派都有责任，都有错误。当年校园内的武斗并非国与国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也不是革命解放战争，更不是反恐战争，没有正义一方。两派武斗的性质属于群众运动中的内讧、内斗之激化。但校文革做为权力机构，支持并指挥一派进行武斗，责任极大，尤其是孙蓬一有着重大责任。

北大的武斗不是突然爆发的，有个酝酿过程。1967年7月10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布置工作，“飘”“零”等校文革反对派冲会场，围攻聂元梓、推搡、殴打孙蓬一。同一时间，“飘”“零”等打、砸、抢、抄、封了二组（学校保卫部），抢了机密档案；同时砸了“南阁”（哲学系文革办公室）。“新北大公社”师生举行了游行抗议，但采取了克制态度，两派并没发生武斗。

7月10日“飘”“零”等抢、抄、封二组是个严重事件。二组是学校保卫部。1966年8月工作组撤走后，工作组组建的“保卫组”（当时称“二组”）因保卫工作的特殊需要被中央批准保留下来——当时“二组”是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组成，不参加学校“文革”运动，专门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



承担对重点专家、来校首长、外宾的保护和警卫) 1966年底, 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 学校又陆续抽调了部分教师、干部充实保卫组, 正式取消二组称谓。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但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 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 独立工作, 纪律规定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保卫组从来没隶属于任何群众组织, 包括“新北大公社”。也从末收集、保存过群众的材料。

1967年7月10日凌晨3点陈伯达又一次来到北大的大饭厅, 与群众讲话, 煽动北大继续分裂、打派仗。就在这次会面将要结束时, 在场的一个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 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 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7月10日天刚亮, 有大批“井”“飘”“零”学生涌进保卫组, 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 保卫组停止工作, 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随后把保卫组人员全部赶走, 由“井”“飘”“零”查封、接管了保卫组。紧接着“井”“飘”“零”用大字报宣布从二组查抄出大量北大师生的“黑材料”。由于当时保卫组有严格纪律, 不参加学校运动, 也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 也从没搞过什么师生的“黑材料”。所以保卫组底气很足, 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 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 “井”“飘”“零”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整个事件是以“莫须有”之名稿打、砸、抢、抄、封, 破坏治安机构, 践踏法制。而此事全是在“陈伯达指示”下发生。陈伯达为什么对如此严肃的涉及治安机构的事情, 不做调查就轻率表态? 唯一解释是他唯恐北大乱得不够, 因此抓住个由头就立马煽呼、挑事。(以上根据保卫组成员、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蓝绍江:《我亲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摘要, 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第931期)

1967年12月30日, “井冈山”绑架了新成立的中共北大党领导小组副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崔雄崑(文革前任北大教务长), 当天校文革召开抗议“井冈山”绑架革命干部崔雄崑全校大会。两派对立情绪骤然升温。

1968年1月16日晚, “新北大公社”邀请西藏“大联指”演出队来北大演出。两派群众都坐在大饭厅要观看演出。“井冈山”武斗队却抢走了“公社”的



广播喇叭，同时打、砸校文革办公室，抢走了校文革公章，挑动武斗。“新北大公社”迅速维持好秩序，恢复了演出大会的正常运行，使文艺演出得以顺利进行，著名歌唱家才旦作玛也做了精彩演出。此次“公社”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双方没有打起来。

1968年1月，“公社”许多战斗队觉得“公社”总部窝囊，对“井冈山”的武斗挑衅太软弱。1月17日在苗学生食堂，“公社”的“红色进军号”战斗队发起炮轰“公社”总部“右倾”的串联会，许多人强调“公社”在武斗中受了损失，对“井冈山”太软弱，要求总部对“井冈山”采取强硬立场。

到了2、3月，两派都组织了武斗队，两派武斗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拿木棍或长矛。长矛是用铁管截成、一头磨尖，十分锋利，是杀人武器。“井冈山”占据了28楼做为文攻武卫指挥部，把“公社”的学生赶出了28楼。“公社”占据了44楼做为文攻武卫指挥部，44楼原是北大招待所。此时双方时有小冲突发生。大约在3月20日左右，公社总部得到报告，历史系一位“公社”的学生，在28楼附近遭到两名手持长矛的“井冈山”武斗队员袭击、追赶，遇刺，幸亏这位学生较警觉，且是田径运动员跑得快，后背只受了皮外伤，没有生命危险。

3月26日前，北大两派武斗局面已经形成，双方时有小冲突，但尚未发生大的武斗事件。有些回忆文章，认为北大武斗扩大、升级是在3月29日，笔者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应是在25、26号两天。

3月25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七个高等院校“地派”的学生近万人，人人手持铁棍，从北大各校门湧进校园，与北大“井冈山”武斗队汇合，要挑起大规模武斗。“新北大公社师生”见状，纷纷加筑工事，准备一战。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得到情报，即将在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后台是支持“地派”的谢富治，而谢还有后后。目的是一旦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出现人员伤亡，就可以把罪名扣到聂元梓头上，从而拔掉聂元梓这颗“钉子”。聂元梓得知紧急状态后，立即赶往市革委会面见谢富治，强烈要求谢富治到北大制止武斗发生，否则有事谢须负责。于是谢随聂在傍晚赶到北大。谢富治到北大广播台，在大喇叭里讲：“外校学生都离开北大，回自己学校去。北大师生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聂说谢富治讲完话以后“外校学生呼拉一下子全走了。”对以上聂元梓描述的3月25日下午的紧急事态（《聂元梓回忆录》第十三章第7、第8

节)，文革后笔者为了搞清楚25日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查阅了当年地院“东方红”的头头之一、王大宾的助手聂树人写的文革回忆录《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其中第12章提到聂元梓所说1968年3月25日下午七院校学生到北大搞武斗一事。聂树人否认有此事，说这是聂元梓“编造”的“假话”。为考证此事真伪，我查看了孙月才公开发表的《文革十年日记》（出版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存有孙月才日记的影印件。）该日记第298页1968年3月25日星期一这一天记载了：“下午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打、砸、抢。新人大、农大东方红进校了，并打伤了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晚7点左右，谢副总理、吴德同志、丁国钰同志亲临北大广播台作重要广播讲话。谢副总理指出：一、希望北大的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联合起来。二、‘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三、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孙月才是“新北大公社”负责人，他当年当天所记的日记，可信性不容置疑。孙月才提到25号下午来北大武斗的外校，只提到二个：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而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是七个学校，其中有地院东方红。聂树人说他不知道此事。那么25号到北大来武斗的外校有没有地院东方红，这是应可存疑的一个问题。但25号下午确实有大批外校地派学生涌入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企图挑起大规模武斗，是确有其事。否则谢副总理便不会在当晚的北大广播讲话中的第三条说“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将来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可以去查谢的这个讲话，在北京市政府的历史档案中应可查到。聂元梓指控此事件有着很大、很深的背景与内幕。这需要将来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去深入调查研究。

## 十、关于孙蓬一反对大联合、指挥武斗的错误

常风在文章中对孙蓬一指挥武斗的错误做了尖锐批评。章铎在文章公布了孙蓬一的检查，应是也确认了孙蓬一的这一重大错误。章文引述了孙蓬一对工军宣队做的书面检查，孙承认“我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章、常二人对孙蓬一的这个重大错误没有原则分歧。

孙蓬一在1967年反吴传启，反王、关、戚、谢，反极左思潮。但到了1968年，他自己也陷入了极左思潮的陷阱，成为校文革、公社中，强硬斗争派的代表。文革的极左路线要追溯到中共中央1962年八届10中全会制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路线直到文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终止，而代之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大实践，毛泽东在文革中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推至极端，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全党、全国斗，斗，斗，陷入了阶级斗争的大乱局。孙蓬一在1968年，不断讲“路线斗争没有调合余地。”，他把“公社”与“井冈山”两派群众的思想认识分歧，视为路线斗争，一定要把对方打垮，甚至不惜用武斗把对方压垮。究其错误根源，盖因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认识北大两派的派仗。泛阶级斗争观念扭曲了孙蓬一的人性，他善良的天性被阶级仇恨所压倒。正如常文所言：“文革这个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来的魔鬼扭曲了许多人的人性和良知，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这些人并非生下来就穷凶极恶，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的驱使下，认为对方就是国民党余孽，就是坏人，而自己是紧跟领袖干革命。”

其实北大两派群众在一段时间内，何尝不是程度不同地与孙蓬一犯了类似错误。北大两派学生在17年所受的教育中，长期接受阶级教育、兴无灭资教育、反修防修教育，崇拜领袖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育，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在文革中两派群众都信神，都无限崇拜伟大领袖，紧跟伟大领袖，反陆平，反工作组，炮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来找不到敌人了，就群众自己和自己斗，相互指斥对立派是错误路线。阶级斗争观灌输给人们的是仇恨和斗争，是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两派学生受泛阶级斗争观念的毒害，人性中的狼性被激活。两派学生生活在一个校园内，本应相互尊重，却相互敌视；本应相互友爱，却相互斗争；本应合谐相处，却相互攻击。武斗是阶级斗争观对部分学生侵蚀至深的表现，阶级斗争观竟然发展到要伤害同学人身的地步。如果说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性中的正、邪大战，那么它存在于每个人的人性之中。因此这是人们应普遍反思之事。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曾经信奉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应深刻反思，重新认识。

文革中，北大两派学生，都曾迷失过、迷惑过、徬徨过，而后又逐步觉醒。

今天我们共同回顾北大文革那暴风雨的岁月，是为着共同记取我们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构建和谐社会，为发扬普世价值，为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与权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一分光和热。☞



## 【目录】

编者前言/王复兴

序：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印红标

### 一、文革前十七年

我在北京大学的前期经历/丁石孙

吹尽狂沙始见金/武际可

我的大学（一）、（二）、（三）/徐明曜

### 二、文革前三年运动主体期

关于“7，12”陈必陶大字报/吴乃龙

黑帮大院/丁石孙

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何子溪

文革期间北京市两大派的争斗/胡宗式

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王复兴

“胜利团”简史/任瑚琏

评一份史料：《号外》——兼议文革时期的北大武斗/王复兴

### 三、文革中后期

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谢甲林

“文化大革命”中“梁效”的顾问冯友兰（节选）/郭罗基

截屏再瞥周一良 /郝斌

附录一：陈寅恪与弟子周一良的恩怨/刘宜庆

附录二：我的父亲周一良怎样进入“梁效”写作班子 /周启博

我所知道的“一打三反”运动 /吴乃龙

### 四、文革综述

电话采访李清崑 /章铎

告别盲从 走向精神自由/孙月才

诗词：悼念丁石孙校长 /众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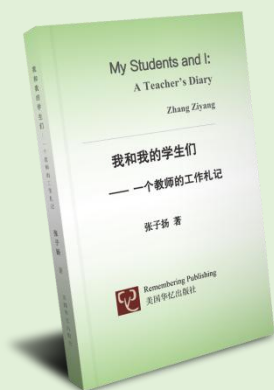
## 【随笔札记】

## 我和我的学生们

——一个教师的工作札记

张子扬

### 内容摘要



作者是一位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的中学教师。本书记载了这位教师和她的学生们相处的三十六个故事。笔者集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之积累，用教育工作者探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独到眼光，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欢乐与烦恼，叙述了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些故事语言活泼，情节生动曲折，充满童趣，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可读性强。它不仅适合从事教育工作的读者阅读，也适合其他读者阅读。

**我和我的学生们：一个教师的工作札记**

张子扬 著

ISBN: 978-1-951135-20-1 (P-平装本)

978-1-951135-21-8 (E-电子本)

LCCN: 20199 917299

出版：美国华忆出版社

版次：2019年12月第一版

字数：119千字



## 自序：我爱每一片绿叶



小时候，我有过很多理想，可就是没有想起当老师。长大了，我当了老师，又觉得当老师就是我的理想。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仿佛就是那“铁打的营盘”，送走了一批批长大的少年，又迎来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孩子。

我最爱看孩子们的眼睛，那眼神充满对老师的信赖，对未来世界的追求；我最爱听孩子们的诉说，那诉说把我带进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我最爱看孩子们活泼的身影，那身影使我忘掉了自己的年龄，把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年轻人的行列中。

我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用自己的全身心塑造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灵魂，孩子们则用他们对我的尊重、信任、理解和热爱不断净化着我的心灵。

我愿做那粗壮的树干，孩子们就像那满树茂密的树叶，我爱每一片绿叶。🌿

2015年7月第一稿

2019年12月第二稿

## 后记：感谢生活

我和学生们的事先讲到这里。

搁下笔，心头竟生出丝丝不舍之情。

这份情感不仅仅对这几十个故事而言，还有对我那段长达三十年的教书生涯的留恋。

我是个平凡的人，过着寻常的日子，但这段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岁月使我的生活有了斑斓的色彩，无穷的回味和连绵不断的幸福。

要感谢的人很多。

我要感谢父母。我的父母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是他们给了我做好教育工作的最初的启蒙。

记得我刚从师范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父亲送给我六个字，“负责任，守纪律”。父亲说，人的能力有高低，成就有高低，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负责任，守纪律”是必须要求自己做到的，这和能力无关。做到了这两点，工作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坚持做下去，工作能力也会得到相应提高。你当教师的，更应该把这六个字视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从教三十多年，这六个字我从来不曾忘记，三十多年的岁月早已将它们演化为我的职业习惯。

我的母亲和我一样，做了一辈子的中学教师，也曾担任过班主任。

对母亲做教师的记忆大多在我的幼年时期，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母亲说，那天上课时，她发现学生中有几个思想不集中，眼睛老是往她身上看，一边看一边捂着嘴笑。下课后，母亲找来那几个学生，见母亲问起来，他们用手指着母亲衣服上的纽扣，笑而不答，母亲那天穿的衣服上的纽扣是菱形的，这种形状的纽扣当时不多见，学生们是看着那些新奇的纽扣发笑。“不行，我要把这些纽扣换掉，老师上课的时候，身上不能有任何容易引起学生关注的东西，那样，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母亲那番像是自言自语的话语给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老师的就要处处为学生着想，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影响学生听课的细节。

我要感谢我插队落户的太平庄的乡亲们，要感谢那段生活对我的历练。

那段生活使我的人生有了两个宝贵的收获，一是平等意识，二是平常心。正因为有了这两个收获，我才能心无旁骛地在普普通通的学校里工作三十余年，和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们结下终生难忘的师生情谊。

我还要感谢董春华和郑绿漪两位老师，她们分别担任过我的初中班主任。

董老师和郑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们的平和，三年里，就没见过她们向我们发火，什么时候都是那么温和，平静，脸上永远洋溢着阳光般温暖的笑意，两位老师的平和给少年时代的我的心目中留下深深的印迹，也为我今后

的班主任工作树立了楷模。而两位老师的优雅却是我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我还要感谢和我共事多年的同行们。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调了工作，我所在的这所学校教研风气甚是浓厚，教师们自发组织教学论小组，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学习教育理论，讨论教学工作，谈起来就忘了时间。那些教学经验丰富，热衷于教学改革的中老年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和忘我的工作热情深深吸引和感染着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我，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阅读教育理论书籍，其中我最喜爱的是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这位著名教育家的理论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科学做好教育工作的无穷魅力。

除了集体讨论，我们还有很多个人的交流，不分时间地点，有了想法，甚至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想法，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在一起聊，个案分析，错误反思，规划设想，心得体会无一不是我们热衷的话题，我有很多工作的灵感就产生于这样的交谈之中。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中，我由一个事务型的班主任逐步转变为研究型的班主任，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真怀念那个时代啊！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学生们。

从我第一天走上讲台，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好老师，这是我终生追求的理想。

如今，当年那个被学生气得流眼泪的青年教师早已成了在工作中胸有成竹，游刃有余的老班主任，这一切变化除了我个人的努力之外，离不开学生们和我的朝夕相处。

我和一个班的学生最多在一起相处三年，学生们那三年的生命轨迹和我的生命轨迹是重合的。一个又一个三年的生命轨迹的重合便形成了我三十多年的人生之路，可以这么说，我和我的学生们是生命的同路人，我在帮助学生的同时，学生们也成就了我，让我实现了做一个好老师的人生理想。

我要感谢学生们让我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世界啊！在这里，我流连忘返，充分享受着工作的愉悦；在这里，我追寻着孩子们成长的足迹，倾听着他们真诚的话语，捕捉着他们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他们每一点细小的进步让我欣喜，他们解不开的心结让我担忧，我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忧伤着他们的忧伤，我的生活因为他们而更加精彩。

我感谢学生们为我搭建了人生的大舞台。

教师工作带给我的愉悦和享受一直陪伴着我，如今，工作时候的艰辛和劳

累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就是美好的回忆。

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这样的特点，也不是所有的人在退休多年之后，还会因为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而其乐融融，幸福绵绵，当老师可以。

感谢生活！📷

【书摘】

## 小金不寻常的成长之路

“张老师，政教处主任喊你去一下！”有学生跑进办公室对我说。

政教处主任找我？那多半是班上哪个学生犯了错，我来不及多想，急匆匆赶到政教处。

政教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警察，见我进去，主任指着那位警察向我介绍：“这位是派出所的同志，他想了解一下你们班小金同学的表现。”

原来，前一天晚上，在湖南路附近发生了一场群殴事件，事件中有人被打成重伤，参与者中有我们班上的小金。但由于他年幼，又是胁从，派出所没有拘留他，建议学校加强教育。

“怎么又是这种事啊！”我心里直犯嘀咕。

小金性格鲁莽，遇事冲动，讲义气，只要有朋友喊他帮忙打架，一喊准去。为了这个打架，他屡次受到学校处分，从警告到记过，再处分就是留校察看了。

我左右为难，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背上留校察看的处分，会不会让他自暴自弃？但如果不处分，会不会让他产生侥幸心理，以后再去打架？

还没等我理清头绪，学校处分已经下来了，由于小金参与了社会上的群殴事件，且造成人员伤害的严重后果，为教育其本人，也为给全校学生予以警示，给小金留校察看处分。

我的心情很沉重，不由的想起两年前刚入学时的小金。小金个头不高，但长得粗壮结实，留着短短的“板寸”，头发浓密粗硬，根根向上竖着，两道浓眉，眼睛不大，眼距较宽。他和老师不太亲近，和他交谈时，他总是低着头，很少看我，也很少搭腔。

他头脑简单，性格冲动，到班上没几天，就经常和同学发生冲突，不管什

么冲突，过程大致相同，先是产生分歧，然后争执，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一出手就伤人。

我曾请过他的父亲到校，这位父亲倒是个爽快人，开口就向被打的同学道歉，转头就骂儿子：“下次再敢欺负同学，看老子怎么治你！”

“你爸怎么治你啊？”我问过小金。

“穿翻毛大头鞋踢呗。”小金说得稀松平常。

小金爱打架的根源在这儿呢！

不过，他以前打架，原因相对单纯，大多是和班上同学发生冲突，说不过人家就动手。可最近不同，他经常到校外打架，这次更了不得，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少年搅到一块儿去了，以后会怎么发展，可说不好。

我得重新观察这个学生，看看在他身上还有什么我没有发现的东西。

经常和男生打架的小金在男生中口碑不太好，可我向女同学了解时，却发现女孩子并不反感他。

“小金蛮好的，反正他从来不欺负我们。”

“他不欺负我们，还经常帮我们。”

这有点意思啊，这一点可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

我找到小金，把女同学对他的评价告诉他，他的脸一下涨得通红，瓮声瓮气地说：“跟女的计较什么？我爸就对我妈特别好，我爸老说，男的不要跟女的计较，就要对女的好。”

他真是他爸的儿子唉！看来，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很大，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变他的性格很困难，但是，我可以试着去修正，去掉鲁莽，保留豪爽，去掉冲动，保留热情。

从此，我开始特别关注起这个学生，这一关注还真的发现，女同学真是挺愿意接近他的，有什么事喊他帮忙，一喊就应。小金长得既不高又不帅，口才一般，他和女同学的相处看不出异性相吸，就像是朋友间的相处。

他性格中的这个特点，我倒是蛮欣赏的，像个男子汉，大度。

我对小金看法的改变看来他是有感觉的，他慢慢的在接受我。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那天上午，小金爸爸匆匆到学校找到我，说有事要问儿子，我接待了他，说等下课吧，有事可以先和我说。

小金爸爸阴沉着脸，“唉，张老师，我跟你怎么说呢？说出来都丢人！”

小金家里昨天来了位家乡人，老乡是来买摩托车的，在他家里住了一宿。今天一大早，老乡就离开他家去办事，结果买摩托车付款时，发现带去的钱款少了三百元，老乡左思右想，觉得这事不对劲，他从乡下来没去别处，就在小金家里住了一宿，如果这钱真的是孩子拿了，三百元钱不算多，但孩子品行坏了可不行。听老乡这么一说，小金爸爸气不打一处来，匆忙赶到学校，想找儿子一问究竟。

“肯定是这小子拿了，这事丢人啊！”小金爸爸气得不行。

小金爱打架，可从没听说他会私自拿别人的钱，我将信将疑。

下课了，我把小金喊来。小金走进办公室，一看见爸爸，脸色大变，站在门口，赖着不肯往里走，一看这情景，我什么都明白了。

小金爸爸气呼呼地拿着三百元先回家找老乡去了，走时，撂下一句话：“看今天我怎么收拾你！”

“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我问小金。

“其实，我本来根本就没有想起来要拿那个钱，夜里起来上厕所，我看那个包鼓鼓的，里面有五万块钱，我就想看看五万块钱有多少，我不知道五万块钱会有多少，结果我一看，有那么多啊，我想，从中间抽几张没人会发现，我就抽了三张，钱我还没想好怎么花呢。”

这孩子头脑怎么这么简单啊！简单到我都没法生气。

初三了，小金的打架行为明显减少，到校外打架斗殴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我对小金说，你只要在初三一年不再打架，老师可以写申请，要求学校撤销对你的所有处分，这是学校的规定，你得配合。

小金真的配合起来，他向我要求调换座位，理由是他想更好地听课。可我怎么看也不像，他现在坐的那个座位怎么就影响了他学习呢？而他强烈要求调换的那个座位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优势啊？

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把他的座位往前调了两排，这样，他离讲台近，



听课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吧。

可我发现，小金并没有喜出望外，对于我的这个调动，他好像有点儿无奈，有点儿沮丧。

小建走到讲台跟前，悄悄对我说：“张老师，你知道小金为什么一定要调换座位吗？”

“我不知道，他说他想更好的听课。”

“才不是呢，他喜欢小倩，他想调到小倩前面去坐。”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给他调动的座位比他以前坐的那个座位离小倩更远。小金噘着嘴巴坐在新座位上，一脸的落寞，我忍不住想笑，你看看我这事做的，整个儿一个南辕北辙呀！

那天放学以后，我在办公室忙着，小建气呼呼地跑进办公室，捂着鼻子，手上满是鲜血。

“怎么啦！这是怎么啦？”我吓了一跳。

“小金打的！”小建气得眼眶通红。

“为什么！他为什么打你？”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干！”

“那他打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就站在路边和小倩说话，小倩在开她的自行车锁，他突然就冲上来，打我一拳。”

我全明白了。

小金低头坐在我面前，本来就不善言谈的他，闯了祸，就更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打小建，因为他在和小倩说话。”我单刀直入。

小金的脸“腾”的一下涨得通红，脑袋瓜左右摇晃，眼睛尴尬得不知往哪儿看。

“其实你很有眼光，小倩真是一个好女孩，长得漂亮，学习成绩又好，人还能干。”

“不是，不是。”小金蹑嚅道。

“可是你想想，你今天当着小倩的面，把自己同学的鼻子打出了血，依你看，她会佩服你，还是会瞧不起你？”

小金愣着，没说话。

“会佩服你？觉得你了不起？”

“嗯，不会。”小金的头摇得像拨郎鼓。

“那就是会瞧不起你，对吧？你好不容易坚持那么长时间不打架，好不容易在同学中重新树立了好形象，这下又给你弄毁了吧。”

那天，我和小金谈了很长时间，他虽然没有说很多，但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真心想改改自己的暴脾气了。

初三一年顺利地度过了，小金没有再打架，我为他写了申请，终于在他毕业离校前夕，学校撤销了对他的所有处分。

还有一个月，学生们就要参加中考了，我忙着为学生们填写“毕业生登记表”。填到小金的表格，我犯了难，在“在校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奖励/处分”一栏中，我不知如何填写，如实填写吧，虽说他所有的处分都已撤销，但那一次次逐步升级的处分还是很显眼的，小金的学习成绩不好，不好的学习成绩加上不良的表现记载，万一到时没有学校录取，把他推入社会，怎么办？他的思想基础薄弱，很容易走入歧途，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是害了他；不如实填写吧，我是不是违反了原则？最终，和政教处的老师商量达成共识，为孩子的前途着想，什么都不填写，但要和他做一次单独的交谈。

在填报志愿的那天，我把小金和他的父母请到办公室，我拿出小金的毕业生登记表，指着“在校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奖励/处分”一栏对他说：“在这一栏里，老师什么都没填，既没有填写你受的处分，也没有填写这些处分都已经撤销，我留了一片空白，我希望，老师留下的这片空白，由你以后自己去填写，记住，老师希望你要填写那些让你自豪，让你骄傲的东西。”

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技校毕业的小金应征入伍。临行前，他特地来学校看望我，三年的时光小金长成了大小伙子。

“张老师，我那时候怎么那么不懂事。有一段时间，我真恨你啊，整天就

琢磨着怎么害你一下。”

“哦，说说看，怎么害我？”

“我想捉几个小虫子偷偷放在你的抽屉里，女的都怕虫子，让你吓一跳。”

“我怎么没看到小虫子呢？”

“我好几次走到办公室门口，想想还是怕你，还是不敢。”

“那现在呢，还想吓我一跳吗？”

“不想了，早就不想了。”小金笑起来，“张老师，你记得当时给我看毕业生登记表的事吗？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张老师你是真的对我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恨你了。张老师，你放心，我以后不会那么不懂事了！”

小金入伍后，经常给我来信，他到部队学了驾驶，两年后，他入了党，还立了三等功。

小金头脑简单，脾气暴躁，鲁莽冲动，又讲义气，这样性格的孩子很容易被社会上的不良少年看中，成为他们的伙伴。这些孩子成绩往往很差，很差的成绩加上很差的表现会使他们很难融入班集体，班集体拢不住他们的心，自然而然，他们就被边缘化了。

曾经说过小定的故事，小定的问题也很多，但是，他再“混”，犯的错误仍然属于“学生犯的错误”。可是，“小金”们却不一样，之所以说他们的成长道路不寻常，是因为他们做的错事已接近犯罪的边缘。试想一下，他们摇摇晃晃地站在是与非的边缘，老师是应该尽力把他们拉回到正常的人生轨迹，还是因为难度太大而放弃对他们的教育？当然不能放弃，尽管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

对待这些孩子，老师一定要有博大的胸怀，满腔热忱地去对待他们，帮他们抹去心灵上的灰尘，唤回他们的良知。与此同时，老师也可以极大地提高自己的教育工作能力。☞

## 【目录】

自序：我爱每一片绿叶

上篇 学生篇

一、宽恕 / 001

- 二、信任 / 008
- 三、无声的交流 / 014
- 四、一张纸条 / 028
- 五、天使与魔鬼的较量 / 033
- 六、解惑 / 043
- 七、神奇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 053
- 八、男孩小瑞 / 059
- 九、小星的烦心事 / 065
- 十、一张报纸的提示作用 / 069
- 十一、课堂小风波 / 073
- 十二、小金不寻常的成长之路 / 077
- 十三、选择 / 085
- 十四、潜能 / 091
- 十五、蓉蓉 / 097
- 十六、我爱每一片绿叶 / 104
- 十七、帮他脱下心灵上的“盔甲” / 110
- 十八、学会担当 / 121
- 十九、蜕变 / 125
- 二十、孩子，别怕 / 133
- 二十一、这书包该怎么放 / 137
- 二十二、性格决定命运 / 141
- 二十三、同样的荣誉，不同的表扬 / 146
- 二十四、新生 / 150

### 中篇 集体篇

- 一、“我们是最好的！” / 168
- 二、难题 / 173
- 三、从野马到千里马 / 178
- 四、热爱劳动是美德 / 187
- 五、关于考试作弊的讨论 / 192

六、留一半给自己 / 200

七、桌布 / 206

八、响鼓也要重锤 / 210

## 下篇 教师篇

一、批评的艺术 / 222

门钩 / 222

粉笔头 / 223

一堆垃圾 / 224

夸夸咱们的初一（6） / 227

二、有些错无可挽回 / 229

三、警钟长鸣 / 231

班级信箱 / 231

评选“最不遵守纪律的学生” / 232

给小金妈妈的一个电话 / 235

让我愧疚的一件事 / 236

他的优点我为什么看不到 / 238

老师错怪你了 / 240

四、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 / 243

一串幸运星 / 243

除夕来电 / 245

一只红苹果 / 247

一幅画像 / 248

细心的小金 / 250

洒满泪痕的周记 / 252

后记：感谢生活 / 255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